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 年 1 月 31 日创刊 2013 年 9 月 30 日第 22 期

## 本期目录

【山西文革专辑 2】

史林一叶

石名岗 山西“一·一二”夺权

赵瑜 震惊各方的山西长治“一·一六”事件

蓦然回首

李辅 在动乱年月当县委书记

编读往来

阎长贵对 20、21 期的感想和意见

---

【史林一叶】

### 山西“一·一二”夺权

石名岗

按：本篇节选自作者正在撰写中的山西文化大革命史稿。

文化大革命既然叫革命，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政权问题。1966 年 8 月 8 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于这个问题给了这样的说法：“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又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这是中共正式文件中第一次提到“夺权”，这个说法对怎样夺权、由谁夺权及夺权之后的政权形式等诸多问题都没有给出答案，对于夺权本身也说得很模糊。不过，这正好说明革命是无法预见和规划的，不确定性和突然性构成了革命的本质。1967 年的“一月革命”风暴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夺权前奏：刘格平进京受旨

革命需要领袖，尤其是夺取政权的时候就越发需要领袖，像法国大革命就有罗伯斯庇尔、马拉及丹东三巨头，像“十月革命”就有列宁、托洛斯基等人组成的领袖集团。当山西的文革面临夺权的时候，像刘灏、杨保明、李青山、杨承孝这样的造反派领袖，在掌握政权方面还显得太年轻，政治经验和理论水平太稚嫩。不过，在革命实践需要领袖的时候，这种领袖就会应运而生，从省委造反出来的干部们就自然而然地充当了这种领袖的角色。

刘格平担任这种角色有天然优势。他没有其他人所具有的强烈的党内派别的色彩；他当年曾拒绝执行刘少奇所传达的中央指示，没有在《反省声明书》上签字，多坐了几牢，反而成为了一种“资本”；他具有四十多年的党内斗争经验，仕途上又受到过打击、挫折，现在，正是该他破门而出的时候了。

时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王力在其《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中对当时的形势是这样说的：“山西，毛主席很重视，因为山西是老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在晋冀鲁豫，中央大量干部是晋冀鲁豫的，晋冀鲁豫以山西为中心。邓小平暂时成为被打倒对象，而山西是邓小平的基地。十二月份，薄一波已被打倒，毛主席、总理都说薄一波手伸得长，他们在山西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时已经宣布安子文是反党分子，安子文与山西的关系很密切。山西省委书记卫恒是安子文同志培养的典型，文化大革命开始，卫恒被认为是坚决镇压群众的。毛主席亲自培养的一个人叫解悦，是太原纺织厂的工人，她写的学哲学的文章受到毛主席的赞赏，她在文革中坚决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起来造反，受到山西省委的压制、打击，很严重。所以一九六六年毛主席认为卫恒不行”。“毛主席一九六六年很早就决定请刘格平到北京来”，“毛主席对刘格平的印象很深，少奇同志也同他讲过刘格平的好话”，“刘格平长期坐国民党的监狱，出狱时刘格平没有签字，没有发表反共启事，他宁可坐满刑期也没签字。他说：‘是党中央的指示我也不能执行。’少奇同志对他是欣赏的，毛主席也是欣赏的”。“毛主席跟我讲刘格平解放后主持民族工作（乌兰夫到内蒙，刘格平主持），毛主席认为有两件事刘格平做得对，一是新疆，王震同志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不妥当，搞得很尖锐，毛主席说他要用武装消灭一个少数民族。毛主席认为刘格平当时反对王震的作法，刘格平是对的，王震不对。第二是处理大小凉山彝族问题，西南局李井泉也过火，也已经和将要动武，刘格平反对他们的作法，毛主席认为刘格平是对的。现在刘格平贬官到山西，毛主席说，山西就让刘格平搞吧！把刘格平叫到北京来，了解一下他的情况，过去处分他到底是怎么回事，要他回山西去，把山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起来。他认为刘格平能掌握局面。刘格平到了北京，本来江青要自己代表毛主席找刘格平谈，可是江青一直没谈，刘格平在北京饭店等了好久。后来主席要我同关锋先去看看刘格平，问问怎么回事，要他回山西。康生是否与刘格平谈了我不知道。”“当时山西毛主席要刘格平回去，还有一个条件，山西出了个张日清，是山西军区第二政委，他支持造反派，受到攻击。攻击张日清的理由是说他违背了军委紧急通知关于‘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用这一条攻击张日清，这也引起毛主席的重视。张日清和李再含（引者注：时任贵州省军

区副政委)不同,李再含只打电报反映情况,张日清真的去支持左派。部队已经介入了。到一月份有个支左决定,其背景就是张日清支持左派的事。当时山西有三个情况,第一有刘格平;第二有解悦,加上陈永贵、李顺达;第三有张日清。有这三个情况,出现这样的苗头,所以毛主席非常重视山西。”(749—753页)

十几年以后,刘格平在他的《对山西省委审查结论的书面意见》(1983年3月15日)中也说到了当时的情况,1966年11月23日,刘格平给毛泽东、林彪、康生写信反映薄一波、安子文等人发表声明出狱,而他本人则如何坚持斗争和北平军人反省院的情况。12月,周恩来、康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刘格平谈话。周恩来对刘格平说,毛主席要你站出来,山西省委瘫痪了,你回去找省委的一些同志组织一个小组,把工作管起来,注意要抓紧经济工作,特别是山西的煤炭很重要。当刘格平表示不好办时,周恩来说,不要紧,中央支持你。山西史志研究院所编的《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纪事 1949. 10—1976. 10》(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年8月北京第1版第400页)记述说,在1967年1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受毛泽东委派在北京饭店与刘格平谈话(一说是受江青委派)。他们让刘先谈拒绝出狱的问题和受处分的情况,然后要刘格平回山西去,把革命群众组织联合起来,争取革命领导干部,把山西省革命和生产的大权掌握起来。还说毛泽东表扬了张日清,说省军区党委9个常委中,只有他1人主张支左,他是少数,可他是对的。你回去后要取得张日清的支持。这两个文献所述的情况与《王力反思录》所述基本能够对上。至于说王力、关锋是受谁委派,这一点王力在其《反思录》中已经说明是毛主席委派的。

刘格平要东山再起必须有中央的支持,他也如愿以偿得到了这个尚方宝剑。

### 夺权策划和五人亮相

1967年1月6日,刘格平奉旨回晋开始策划夺权活动。

刘格平在山西没有什么根基,由于抗战时期一直在监狱里,山西在抗战时期建立的根据地都与他无关。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人家太行、太岳派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只好从“敌我矛盾”和外来干部中来组织其夺权班子。

袁振、陈守中既被省委打成“反党集团”当然是“敌我矛盾”;刘志兰(时任山西省委农工部副部长,原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烈士遗孀)这时是陈守中夫人,至少也算半个“敌我矛盾”;刘贯一是行政五级的外来干部,屈居山西副省长;何英才(时任省委常委,省政协副主席,党组书记),山西洪洞人,早年在太原兵工厂当工人,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在太行区工作(曾任太行区组织部长),随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后,在湖北工作了一段时间,建国后一直在北京搞工会工作,曾任全国农业工会主席。不知什么原因1964年到山西工作,当属外来干部;张日清是军队干部,开国少将,福建长汀人,1930年参加红军,没有参加长征,随项英、陈毅等在南方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后一直在新四军工作。文革时张日清任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陈守中、刘志兰原来都在包钢,与袁振(原鞍钢党委第一书记)同在钢铁系统,何英才则与袁振同随刘邓南下,

又同在湖北工作过；张日清是中央指定要串联的对象，过去刘贯一与张日清同在新四军，串联起来比较容易。

余汝信、曾鸣《文革“全国第一夺”——山西“一·一二”夺权概述》对当时的串联情况是这样说的，“刘格平 1967 年 1 月 6 日由北京回到太原，住进山西省军区招待所。随后开展了紧张的串联活动。经刘贯一介绍，刘格平首先与张日清谈话，策划在山西的夺权事宜。此前，受刘格平委托，刘贯一与张日清联系。刘贯一在省军区招待所与张日清见面时说：‘我们都是新四军的老同志，彼此可以随便说说心里话。’他继续说：‘山西的领导权基本控制在走资派手里’，‘山西的领导干部虽然派系很多，什么太行、太岳、晋西北、晋察冀，但是基本路线上是一致的。’他还向张日清介绍了刘格平的情况，称‘刘格平是个老同志，行政三级，1923 年加入青年团，1926 年入党，长期在白区工作，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关押的时候坚决斗争，不在反共声明上签字。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山东工作。解放后担任过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全国人大民委主任，是受迫害的干部。’刘贯一又说，有几位革命领导干部准备站出来‘和群众一起革命’。张日清表示：‘你们站出来革命，我支持你们，省军区支持你们’。刘贯一还先后同袁振、何英才、陈守中谈话，动员他们‘站出来革命’，他们完全同意。当刘贯一、何英才分别向省委书记处书记郑林、朱卫华，省委常委郭钦安表露要他们三位参加造反夺权的意图时，均遭到拒绝。刘格平、刘贯一试图争取一些省级领导干部造反夺权的活动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但刘格平等人并不泄气，遂于 1 月 8 日在省军区招待所开会，研究确定行动部署”。（华夏文摘增刊 514 期·文革博物馆通讯 348 期及华夏文摘增刊 517 期·文革博物馆通讯 351 期连载，2006 年 7 月 24 日、8 月 6 日）

据刘贯一在《关于刘格平 1967 年 1 月 6、7 日开会的情况》（1973 年 8 月 11 日）中回忆：“约一月六日或七日，刘格平同志等返回太原，在未回家的情况下，即直到山西军区客舍找我，他告我，中央已指示他联合一些同志站出来，并组织一领导机构，领导群众运动。我问刘，中央哪位具体领导和你谈的？刘说：‘你不必问这方面的情况’等语，刘接着问我串联的情况，我都如实地向他作了报告。刘指示我通知以上同志，于翌日上午集合到军区客舍开会，由刘传达中央指示。”据陈守中在《张日清和山西省核心小组的关系》（1973 年 8 月 12 日）中说：“1967 年 1 月上旬（五日、六日或七日，记不起来），刘格平从北京返回太原后，在山西省军区招待所曾有一次集会（参加这次集会的有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袁振、续纯实和我），会上刘格平说他在北京见到了总理和康老，说中央领导同志授意他负责组织起来，革山西省委的命。在这次集会上议定两个问题：一是写揭发原省委的大字报；二是成立山西省核心小组。省核心小组由四人组成，即刘格平、袁振、刘贯一、陈守中。当时曾反复讨论了张日清参加核心小组的问题，最后议定张日清不参加核心小组，但以顾问身份参加核心小组的活动。”

1967 年 1 月 9 日，刘格平、刘贯一正式亮相，公开树起反旗，在省委、省人委门口和五一广场贴出了反省委的第一张省级干部的大字报。大字报的题目是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究竟干了些什么坏事情》，矛头直指卫恒和王谦，把他们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把他们与彭、薄、安、陶这条“黑线”连了起来。大字报号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必须彻底追查、弄清这一反革命案情”。

1月10日，刘格平、刘贯一、袁振、何英才、陈守中等五人写的题为《请看以卫恒、王谦为首的钻进党内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罪行》的大字报（习惯上称“五人大字报”）出现在省委、省人委门口，并打印成传单到处散发。按《文革“全国第一夺”——山西“一·一二”夺权概述》所述，这张大字报分五个部分：一、省委抱着彭真的二月提纲不放；二、省委坚决贯彻执行并进一步发展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省委纠缠袁振问题使山西文化大革命一错再错；四、省委玩弄“三千会”继续欺骗、镇压干部和群众；五、省委以卫恒、王谦为首的一小撮人是破坏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五人大字报”指控卫恒、王谦等人的种种“罪行”，写道：“山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不是再检讨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了，而是属于钻进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了。”结尾套用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1967年元旦社论结尾的七个口号并加了“中国共产党万岁”一句。这张大字报中“山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不是再检讨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了，而是属于钻进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了”这句话，把革命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检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是一个犯错误的问题，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成为革命的对象了。

不过话说回来，把山西省委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在有点冤。在历史上，山西省委一直很左。1951年4月17日，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华北局提交了一份题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提出了农业合作化的设想。该报告由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亲自起草，省委扩大会议反复讨论定稿，由时任长治地委书记的王谦亲自呈交主持华北局日常工作的刘澜涛。结果刘少奇对该报告进行了批评，并在该报告写下批语：“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的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另一农业极左路线的发明是1958年树立的大寨典型，可以说，这个典型贻害了中国农业至少二十年。如果我们联系王谦在文革后期重新在山西执政后推行的极左农业路线的话，说山西省委“走资本主义道路”显然是不公道的。

“五人大字报”是一份宣言书，是省委的“地下”核心小组公开化的宣言，宣告了核心小组成员与旧省委的决裂。“五人大字报”的另一个意义是，山西的文化大革命有了明确的目标，也有了自己的政治领袖。

像“五人大字报”这样省级领导公开造反的事件，当时在全国都是第一次，作为一个榜样，不但在山西有着重大影响，而且在全国也有着示范作用。

### 造反派组织的分野

“五人大字报”像一场八级地震，它引起的海啸立即冲击了太原的各个角落，各个造反派组织也必须在短时间内对此事件表态，否则在这个十字路口有可能迷失方向。

最早表态的是北京农机学院《全无敌》纵队，在10日当天就发出《致山西革命干部的一封公开信》，为“五人大字报”叫好，称“五人大字报”“吹响了决战的冲锋号”，鼓动党政机关干部“站出来，冲上去”，“向卫恒反党集团发起总攻击！”

次日，山西革命造反兵团散发了题为《目前时局和我们的任务》的传单，赞扬刘格平等“率众造反”是“大气岿然，斗志大振”。揭露山西省委领导人与“黑帮”彭真、薄一波、安子文、陶鲁笏的“黑线”关系。兵团之所以如此迅速支持“五人大字报”，与袁振有很大关系。1月7日，华北局宣布给袁振平反，当这一消息从兵团驻京联络站传来之后，兵团小将极度兴奋。特别是华北局候补书记张邦英被兵团驻京联络站人员挟持到太原，亲自宣布此决定，这表明他们造反的目的获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袁振一下子从“坏人”变成了“好人”，能不感激兵团小将？！他很有可能事先把“五人大字报”和即将夺权的底透露给兵团小将，而兵团岂能不支持“五人大字报”？岂能不支持和参加夺权？！

也在1月10日，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王力、关锋在北京《红旗》杂志社接见山西造反派代表，称“刘格平是经过考验的干部，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你们要支持刘格平”。在刘格平等五人树起反旗之后，用现在的时髦语言来说，就是有一个“双向选择”的问题。有一些组织，特别是较小的造反派和运动开始时有站错队嫌疑（即保皇或保守）的组织，有的急于寻找靠山，有的急于改换门庭，就会自然聚集在刘格平的大旗下。但是，那些“响当当、硬梆梆”的造反派就不见得买刘格平的账了。对于刘格平来说，仅仅是军队支持是不行的，因为军队不可能直接参与夺权。因之，刘格平开始寻找各大造反派组织要求支持。

据太原工学院红旗队长李青山在博文中回忆：

应当说，刘格平等人的夺权并不是背着当时山西“响当当的造反派”太工红旗进行的。1967年1月7日（8日？）晚，他派人神秘地领我到山西省委西院的一个房间内。在场的除我外，还有几个人，记得好像有我太工红旗省委支队的梁裕权、有太工永红战斗队的队长高祥（高命儿）、俞俊明，好像还有太原机械学院的一个什么战斗队的人。一个老头十分神秘而紧张地对我们说：“山西省卫恒、王谦、王大任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五级干部刘贯一、三级干部刘格平、八级干部陈守中、十级干部刘志兰以及何英才，奉中央文革之命，领导山西文化大革命。他们要站出来，写大字报，揭发旧省委的问题。”他说：“一旦他们的大字报贴出来亮相，震动将会很大，卫王王一定会疯狂反扑，迫害他们，希望造反派保护

他们的安全。”他的谈话使我很吃惊。刘贯一我认识，他原是全国人大副秘书长，当时是山西省副省长，1964年我曾在湖滨会堂听过他的报告。但现在，他们提出的问题，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对他的话充满怀疑，因为：

第一，他们都是山西本地的干部，刘格平、刘贯一是山西副省长，文化大革命烈火还没有来得及烧向他们，他们本人是不是革命的，还没有经过群众的审查；我们也没有听说他们与卫恒有过什么分歧，作过什么斗争。我们如何能相信卫恒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他们却是革命干部，可以不经文化大革命的审查就直接来领导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呢？

第二，他们自称奉中央指令，但却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我们怎敢轻易相信？中央文革怎能让一个还没有经过文革审查，没有在群众面前亮过相的本地干部来领导一省的文化大革命呢？这在全国没有先例，也不合逻辑；

第三，省委主要领导卫王王，是主要炮轰对象，他们对待文化革命的态度有严重问题，但是否已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没有足够材料支持，还正在审查之中；高级干部站出来揭发他们，我们当然欢迎，但是复杂的斗争形势使我不得不从多个角度去考虑问题。我需要看看刘格平他们究竟能揭发出些什么材料，能证明卫王王确已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第四，当时的宣传调门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陶铸上升到中央第四把手几个月即被打倒的事实告诉我们，文革的斗争是极为复杂的，处在造反第一线的我们，当时只能相信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其他人一概不敢轻易相信。对于这样一个政治面目“不清”的当权派，以及他们不合逻辑的举动，我们怎能不保持警惕呢？

由于事出突然，满腹狐疑的我当时只能表示：欢迎并支持他们揭发省委的问题，其它事项待我们商量后决定。

李青山的举动说明他实际上已经不同意夺权，至少不同意与刘格平一起夺权。这说明李青山的思想显然落后于当时的革命形势。太工红旗作为红联站主力中的主力，他们对于夺权的态度对红联站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是，红联站的个别组织还是参加了刘格平的夺权，甚至最终脱离了红联站，其中与太工红旗同校的太工永红就是一个典型。李青山当时可能有点“唯我独革”的思想，从他的博文中可以看出，太工红旗的活动常常独立于红联站，他不但看不起其它造反派组织，甚至看不起红联站的其他大、小兄弟。也可能是他不屑于同高命儿为伍，最终拒绝联合夺权。

从刘贯一对李青山的话来看，刘格平等人非常希望得到革命造反派们的保护和支持。1966年12月份，各大造反派组织都陆续进驻省、市委，与各级领导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刘格平等人找到他们并不困难。

工人兵团是一个庞大的造反派组织，太原市几个万人以上的大型国有企业都有它的下属组织。普通工人出身的没有政治管理经验的太重工人张建国、李宝顺有点像隋末农民起义军瓦岗军领袖翟让一样，是否能长期压得住阵值得怀疑。但是身为工人兵团总指挥的张建国倒是一腔热血要对省

委的走资派卫王王造反，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张总指挥痛快地答应了刘格平等人的要求。

当时已成为山西四大造反派组织之一的决死纵队支持袁振的态度却是很明朗的，从而支持夺权的态度也是明朗的。十三冶的许多职工来自鞍山钢铁公司的冶金建设公司，在袁振担任鞍钢党委书记（1960年3月）时，曾经推出了著名的《鞍钢宪法》，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即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办法（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进行管理。《鞍钢宪法》与当时盛行的苏联的《马钢宪法》（指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代表的苏联一长制管理方法）相对立，毛泽东曾对《鞍钢宪法》有很高的评价。这也提高了袁振在鞍钢职工群众中的威望。谁也没有想到在文革中此段历史居然为袁振赢得了一定数量的民意支持。据传说，决死纵队支持袁振的另一因素竟然是：决死纵队司令杨承孝的母亲曾作过袁书记家中的保姆，两家有着密切的私人关系。这一点今天可能已经无法考证，但杨承孝的造反与袁振有很大关系却是可以肯定的。据当时省人委秘书李玉明撰写的回忆录《卫恒之死》所述：1966年10月，“太原钢铁公司工人郭某（指郭耀忠）和十三冶金建筑工程公司工人杨成效（指杨承孝）专门到了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袁某（指袁振）家。袁某对他们说，当前有许多工人去北京串联，你们也应该去北京看看形势，也应当发展工人组织。他们俩回家后，过了五六天，杨成效找郭某说：咱俩去北京吧，路费有老袁支援。郭某因没有请准假未去。杨成效和一些红卫兵去了北京。五天以后，杨从北京回来，和一些工人于10月19日发起成立‘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简称‘决死纵队’）。杨成效任头头，郭某任组织部长，主要观点是‘保袁某，打卫王王’”。

### “一月革命风暴”自山西始

许多有关文革的论著中都说1967年“一月革命”的夺权风暴自上海始。其实，重温1967年1月的记事将证明，“一月革命”的夺权风暴自山西开始，最起码是山西与上海同时开始，而在山西率先取得了省一级夺权的成功。

**1月1日** 山西红联站太工红旗在太原有线广播站革命造反派的配合下，夺了“卫王王集团”控制的太原有线广播站（当时由于技术、经济的落后，太原市还没有无线广播电台）的大权，改名为“红旗有线广播台”，发表了生气勃勃、充满战斗精神的《元旦献词》。在献词中指出：“山西省委卫王王等一小撮走资派是一个地方主义、山头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鼓励全省人民起来造他们的反。这是山西省第一次向卫王王的夺权行动，也许是全国第一次向走资派的夺权行动。此次行动拉开了山西“一月革命”风暴的序幕。

**1月3日** 上海《文汇报》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接管了《文汇报》，一举夺了报社的大权，揭开了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序幕。



**1月4日** 山西红联站调集党校东方红、太工红旗、太机红旗和赴晋大队近千人，由杨保明、段立生带领，乘坐一辆大轿车和十几辆大卡车，开赴榆次县（当时晋中地委、行署所在地，距太原30公里），抢缴山西省委隐藏在晋中地委的整学生的黑材料，并且去造晋中地委的反。过程中受到晋中地委干部的阻挠，在红联站晋中分站、轻院东方红及其他晋中造反组织的支持下，排除干扰，缴获了十几个文件柜，运回省委党校东方红公社总部进行开柜检查（开柜后柜内空空如也，事后才知道省委早有准备，将所有黑材料转移至了祁县乔家大院和交城）。这就是震惊山西的“元四事件”。事件后，红联站轻院东方红、榆次一中、二中的革命造反派与晋中的保守派，在榆次的十字街头，就抢夺黑材料等问题辩论了好几天，而且常常至深夜不肯散去，晋中的文革之火就这样被点起来了。

同日，红联站还抢回了太原市委存放在机要室的黑材料。

**1月5日** 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等十一个革命造反派组织的《急告全市人民书》，题目是《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据徐景贤回忆录《十年一梦》所述，该文件是由当时他们要打倒的对象、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签发的。

**1月6日** 刘格平奉旨回晋策划夺权。

同日，上海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会上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等十余位上海市委领导人。这次大会后来被认为是上海夺权的标志，其实这次大会并未宣布夺权，反而命令包括陈丕显、曹荻秋在内的“各级干部坚守岗位”。

同日，红联站太原七中红旗向学校“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成功，这是山西基层夺权的首次胜利。

同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革命造反派夺了报社的权。

**1月7日** 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赴晋大队等组织在太原五一广场再次联合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陶鲁笳及卫、王、王。

同日，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军委拍发电报，请示人民解放军支持夺权问题，表示了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态度。

**1月8日** 刘格平、刘贯一、袁振、陈守中组成山西省委核心小组，作好了夺权准备。

**1月9日** 毛泽东批示向全国播发《告上海人民书》。《人民日报》在发表此文时加了重要的编者按，其中传出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个大事必将对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同日，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革命造反派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了《紧急通告》，提出了反对经济主义的十条意见。该通告仍由尚未被夺权

的陈丕显签发。

同日，山西工人兵团和山西大学八八红旗共同研究向卫王王夺权的问题。

同日，兵团、赴晋大队等组织在太原并州饭店斗争卫恒。过程中，造反派亮出了工人兵团在卫恒家抄家时抄出的印有蒋介石彩色头像的国民党的传单，还有手臂折断的毛主席瓷像（另有一说是石膏像），以说明卫恒是道道地地的反革命。实际上，传单是台湾国民党政府用高空气球放飞过来的反共宣传品，是省公安厅报给省委第一书记的工作资料；至于说瓷像更不是什么问题，即便是再神圣的物品也有损坏的时候，如佛像，如维纳斯女神。但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代，面对这个特殊的历史人群，卫恒像“秀才遇到兵”，十分无奈，只能愤怒呐喊：“政治陷害是吓不倒人的”。说卫恒是反革命，说 1938 年参加革命的卫恒与国民党有什么联系，应该没有人会相信。

1 月 10 日 刘格平、刘贯一、何英才、袁振、陈守中五人大字报亮相。

1 月 11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为上海三十二个革命造反派组织的《紧急通告》发出贺电，称赞他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以实际行动执行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模范。你们及时地识破了和揭穿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进行了有力的还击。”“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战斗任务。”

同日，山西红联站省委党校东方红进驻山西省公安厅，准备开展与卫王王掌握的旧公安系统的夺权斗争。

### 震撼全国的三天

1 月中旬，山西出现了当时全国许多地方都有的一种局面，这是一种真正的无政府状态，在太原，三个政治中心正在各干各的事。

正统的政治中心山西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不像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那样气粗，公开宣称：在中央没宣布前，我还是上海市的领导，还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还得负责上海的工作。山西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卫恒及其他主要领导采取了回避与造反派正面对抗、“转入地下”的方法，离开省委、省人委大院，转移到太原市郊区北营省直机关的一个直属仓库，留在省委、省人委的只是几个秘书，为他们“探听”造反派的消息。据太工红旗的张玉峰回忆，后来他在北京学习班时，与省委常委、秘书长史纪言住一个房间，提到了当时的事情。史纪言说，当时省委领导们得知“一·一二”夺权的消息，并得知红联站反对夺权后，曾经考虑集体投靠红联站，只是因为他们很快就被兵团、决死纵队抓走，投靠红联站的意图没有实现。

刘格平在省政府的家是一个政治中心，几个要造反的省级革命干部、军区领导及革命组织负责人集中在这里，议论策划夺权的事情。

红联站总勤务站所在的省二招是另一个政治中心，这个全省最大的学生造反派组织的各校负责人集中在这里，考虑和议论着对待夺权的态度。

山西省正处于一种政治真空状态，恰恰是这种真空状态孕育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风暴。

上海的造反派虽然闹腾得很凶，声势也大，并且惊动了中央，继1月11日中央贺电之后，12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的《紧急通告》和《文汇报》、《解放日报》发表《紧急通告》时的《编者按》。同时《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但幕后操作的张春桥、姚文元及前台的头面人物徐景贤都还只是在反对经济主义问题上打转转，没有公开提出夺权的口号，从而也没有走出夺权的第一步。

就在这时，山西的刘格平悄悄地做好了夺权的准备。

**1月12日上午** “刘格平和刘贯一在省军区招待所研究给上海工总司等革命造反团体发贺电的事宜。下午，刘格平、刘贯一在这里和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北京农机学院《全无敌》纵队、太原工学院永红战斗队等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商讨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局势与任务，决定当晚在刘格平宿舍召开山西省左派联席会议，研究成立全省统一的造反派组织问题，以山西造反派统一组织的名义给上海工总司等32个组织发贺电，并商讨夺权问题。”（《文革“全国第一夺”——山西“一·一二”夺权概述》）

**1月12日傍晚** 省政府大院刘格平家的周围，布满了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和造反派队员。刘格平家中充满了类似俄国“十月革命”指挥中心斯莫尔尼宫的气氛，各类人员进进出出等候和执行指令。刘格平在其家里召集了决死纵队、兵团、工人兵团、赴晋大队、红联站太工永红、红联站捕猎大队、山西革命干部造反兵团（简称“革干兵团”）、山大八八红旗等十六个革命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开会商量夺权部署，据后来有人回忆，参会的主要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有杨承孝（决死纵队）、宋捷（兵团太工瑞金）、崔杰娃（兵团十二中红旗）、李金渭（兵团六中32111）、吉顺行（红联站捕猎大队、冶校东方红）、高翔（红联站太工永红）、朱永庚（赴晋大队，北京铁道学院）、邢晓光（赴晋大队，清华井冈山）、张建国（工人兵团）、方培泉（山大八八红旗）等人（其中吉顺行、张建国是否参会众说不一）。至于兵团司令刘灏为何没有参会也有两种说法，一是刘灏对夺权没当做什么大事，故委托副手宋捷前往，二是刘灏当时正在热恋中，没能顾得上前去参会。按刘灏自己的说法是，他对夺权的事吃不准，先派副手试探一下。

除造反派负责人外，参会的有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造反的革命干部刘贯一、袁振、陈守中、刘志兰及刘格平夫人丁磊（省人委办公厅信访处干部，一·一二夺权后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委员，省核心小组解放干部领导小组成员并分管党群口）。据时任山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李一夫之子李飞飞回忆，其父在晚饭后到刘格平家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刘贯一主持。刘格平作了首席发言。在发言中刘格平传达了他从北京带回来的中央精神，重申了五人大字报的观点。“刘格平说，今天晚上请来大家，是要研究夺权问题。我们认为夺权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非解决不行。卫恒等人把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引上邪路了，不把他们手中掌握着的党政财文大权夺

过来，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就会夭折。夺权靠一两家造反组织不行，各个组织必须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总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名称就叫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吧。这个总指挥部既是大夺权的领导机构，又是夺权以后的临时权力机构。今天我们向大家宣布，我们几个人，有贯一同志、张政委、袁振同志、守中同志，已经成立了一个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这个核心小组代行省委职权。但我们核心小组每个人都不参加总指挥部，我们核心小组是总指挥部的顾问机构，我们当你们的顾问。总指挥部采取巴黎公社的选举办法，由你们自己推选领导人，我们几个人作为个人意见，也可以提一些人名，供你们参考。”接着刘贯一讲话。他讲了夺权的意义和当时山西的局势。（《文革“全国第一夺”——山西“一·一二”夺权概述》）

“会议本来准备在谈论成立总指挥部和夺权问题之后研究给上海工总司等发支持电的事情，但在会议中间刘志兰给了刘贯一一份《关于省委特务活动及黑二、三线人物名单》的揭发材料，刘贯一当众宣读了这份材料。突然太原十二中红旗战斗队负责人梁振华跑进会场，向与会者出示了从卫恒住宅中查抄出来的所谓‘反革命特务罪证’：一、一尊全身的毛泽东石膏像，其前臂断掉（该战斗队在查抄卫恒住宅时摔断的——转引者按：此释有误，据时任省人委秘书李玉明撰写的回忆录《卫恒之死》所述，该瓷像为1959年介休洪山陶瓷厂所赠，摆在卫恒家中的办公桌上，后因抹桌子时不小心摔断）；二、若干张当时台湾国民党当局向大陆空飘的反共传单（系山西省公安厅从本省收集起来作为敌方动态送省委领导人的）。对此他们却深信不疑，顿时对毛泽东个人迷信的狂热情绪笼罩会场。有几个造反组织的负责人提出：‘先把黑省委二、三线人物抓起来，抄他们的家’。这一动议即得到与会者的赞同。他们立即调集各自组织的人员，分头查抄卫恒、王谦、王大任、贾俊、武光汤、赵雨亭、刘开基等省委领导人的住宅，并对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赵力之、副省长兼省人委秘书长卫逢祺和赵承亮（省人委办公厅干事，代管省人委党组机要文件）实行控制，限制人身自由。”（《文革“全国第一夺”——山西“一·一二”夺权概述》）

所谓“反革命罪证”可能是1月9日或以前抄出的。至于是谁摔断的毛主席像的手臂，已无从考证。上述“太原十二中红旗战斗队查抄卫恒住宅时摔断”的说法，来自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文化大革命”中山西省“一·一二”篡党夺权事件的专题资料（送审稿）》（1987年8月25日）。历史地分析，当时的中学红卫兵还比较天真单纯，对领导干部进行政治陷害的可能性不大。

“抄家以后，刘格平继续和各造反团体负责人在他的住宅开会。张日清、刘贯一等人论及‘敌人的严重情况’和夺权行动的迫切性。”张日清说：不能等待了，必须夺权，接管省委、省人委，搜查卫王王和逮捕特务分子。还说，不要看卫恒是军区政委，他别想动我一兵一卒。“当即经与会者一致同意，决定成立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推定杨承孝为总指挥，朱永庚、宋捷、张建国为副总指挥。特别是与会者看到了卫恒的所谓罪证之后，一致要求立即进行夺权。当即制定行动方案。调集了1万余人，由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带领分两路到太原市府东街山西

省委和省人委驻地，新建北路太原市委和市人委驻地进行夺权。张日清命令山西省军区所辖的在省委、省人民委员会担任警卫工作的部队全部撤走。夺权的造反组织如入无人之境，查封办公室的文件档案柜，取走印章。但省委机关干部并不承认这次夺权行动，坚持上班。直至 19 日，省委办公厅办公室主任等坚持逐日向中共中央和华北局电话汇报。为防不测，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于 13 日又从其下属组织中调集了 5000 余人到省委、省人委驻地担任警卫。”（《文革“全国第一夺”——山西“一·一二”夺权概述》）

夺权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意外：山西大学八八红旗退出夺权。

在方培泉回校调集队伍时，山大八八红旗的领袖李大纲、侯光天、王守仁等人却在参加夺权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他们对夺权与太工红旗有着极其相似的看法，都认为存在着刘格平等亮相不够，夺权队伍不纯，没有中央指示等问题。最终山大八八红旗还是决定退出当晚的夺权行动

关于红联站太工红旗在当天的动向，李青山在博文中是这样说的：“1967 年 1 月 12 日夜，我乘车从省委回太原工学院。一出省委大门，就感觉情况异常，在府西街口、大南门、迎泽大街、迎泽大桥桥头、都有解放军荷枪实弹，架着机枪把守；迎泽大街上，从西到东上百辆大卡车满载工人，一字排列在大街上，气氛紧张，但没人说话，也没人阻拦我们的小汽车。第二天，传来消息说，刘格平他们在新建路礼堂宣布已经夺了省委省人委的权，把省委党氏兄弟（引者按：指保省委的省委干部，他们在写大字报时，都以“党”为姓化名出现，如党育生、党育红、党新生等，故称为“党氏兄弟”）及省委主要领导卫王王和他们的秘书都抓了起来。”当时李青山是在拒绝参加夺权后出来的，还是从太工红旗驻省委联络点出来的，李青山没有说明。

1 月 13 日 太工红旗没有参加夺权。李青山的博文回忆：

这是一个重大事件，作为当时在省城有重大影响的造反派，我们需要及时作出决策，表明态度。但这个夺权如此匆忙，一个省的党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就这样被几个下属宣布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夺权，被抓，他们有这个权力吗？我认为这应当是中央的权力，而不是他们应有的权力；夺权，应当是中央光明正大的决定，而不应是任由下面几个干部自己宣称。我认为他们的作法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符合当时两报一刊社论的精神；但如此离谱的事情，似乎也不是他们几个自己够胆做的。对如此重大的问题，需要召开全队大会讨论。于是，我们立即召开队委扩大会议，研究局势。广大的红旗战士也十分关心此事，参加会议的人很多，讨论非常热烈。经过讨论，决定：

1）立即再派人赴京向中央汇报这一情况，看中央有何指示；

那时我们也知道，到北京去找中央文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除了问中央文革外，能问谁呢？能相信谁呢？

2）立即发表文章，表明我们的观点，即

A）是否夺权，怎样夺权，夺了权由谁领导，只能由中央决定，中央任命，群众参加，不能由某几个当权派自行宣称；

B)提醒全省人民要谨防政治扒手混水摸鱼;

这是我们发表的第一个告全省人民书,简称“一告”。“一告”由我执笔写成,太工红旗群众大会讨论通过发表。

刘格平很可能从支持夺权的太工永红那里事先得到了太工红旗辩论夺权的情况,1月13日中午,刘格平紧急召见红联站主要负责人、太工红旗的杨保明,要求红联站支持他们夺权,并说,如果红联站参加夺权,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副总指挥的位置留给红联站(总指挥由代表工人阶级的十三冶决死纵队的杨承效担任)。

杨保明回到红联站征求意见,未获支持。他又匆匆赶到太原工学院太工红旗队部,劝我们改弦更张,退一步,那怕暂时支持刘格平。我们召开大会激烈讨论,大多数队员都不同意,所以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一告”于13日下午开始向外界散发和广播。显然,我们的观点实际上是站在了他们夺权行动的对立面。文章一发表,就引起巨大的反响,因为它的论点比较符合大多数人的看法。夺一个省的大权非同儿戏,大多数群众组织对这个夺权持观望态度,有些参加夺权的组织也发生怀疑,持消极态度,给刘格平控制局势造成很大困难。

太工红旗《告全省人民书》(“一告”)的发表,宣告了太工红旗站在了刘格平的对立面,也站在了“一·一二”夺权的对立面,对山西省十年文革的格局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据省委七一公社的李辅回忆,夺权前在太工红旗驻省委联络站,李青山曾经征求过李辅对夺权的意见。当时李辅认为,刘格平在历史上犯过严重错误,一是生活作风腐化,曾经糟蹋过60多个女性,二是地方民族主义问题,刘在宁夏时企图搞真正的“自治”,把宁夏搞成自己的独立王国。因为这两个问题,刘格平从相当于副总理级的三级干部降到山西担任副省长,建议李青山不要与刘格平这样的人搞在一起,不要参与刘格平等人的夺权活动。不知李青山是不是采纳了李辅的意见,反正是太工红旗没有参与夺权活动,并用“三评两告”的实际行动竖起了反对刘格平夺权的大旗。

连续几日,红联站在其总部召集下属各组织负责人紧急会议,讨论山西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及对刘格平、总指挥部的态度。会议的讨论非常热烈,有的同意参加总指挥部;有的认为总指挥部严重不纯,混入了保皇组织;有的认为红联站是山西最早最大的学生造反派组织,应该与总指挥部并列夺权;有的认为刘格平、刘贯一等人亮相不够,在三干会的表现站在省委一边;甚至有人认为卫恒等人只是执行了资反路线,不见得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能由刘格平等几人定性,刘格平等人的夺权是反革命政变。据当时党校东方红的段立生回忆,当时的主流意见是:

1)刘格平本人有严重问题,反对与其合作夺权;

2)即便是夺权,也应该由红联站牵头夺权。总指挥部严重不纯,决死纵队也只是一个单位的组织,根本没有资格领导夺权;

3) 夺权绝不是夺几个印章的简单问题，应该迅速夺取公安、舆论等要害部门的权。

4) 对于已参加“一·一二”夺权的红联站组织如太工永红、捕猎大队不予制止，采取等待态度，如果中央表态支持“一·一二”夺权，红联站也有回旋余地，如果中央表态反对“一·一二”夺权，红联站则正好在正确立场上。

最后，反对参加总指挥部的意见占了绝大多数，形成了五条决议：

1) 目前向黑省委夺权是斗争的大方向，应立即行动起来，联合夺权；

2) 总指挥部中的工人兵团、赴晋大队、兵团、市委红旗等均是与我们共同战斗过的革命造反派，向卫王王集团夺权的大方向正确，故对总指挥部的行动应予以支持和配合，把矛头对准卫王王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并且对反动保皇组织“工联”、“百万雄师”等要马上采取行动。另外应对卫王王集团控制的宣传机构和专政机构要立即进行夺权。

3) 总指挥部中有部分组织是最近几天新成立的，对其不甚了解，应立即对其成分进行调查；

4) 刘格平、刘贯一在前段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在革命群众中“亮相”，临夺权前几天才有所行动。刘贯一在前段文化大革命中和刘格平在三干会上的表现都不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核心小组的这些成员不敢轻表信任，决定派出代表赴京请示中央；

5) 决定对总指挥部在组织上不参加，在行动上予以配合。

工人兵团虽然参加了夺权，但在夺权后，不知道受到哪个组织的影响，认为领导干部在夺权前“亮相”不够，总指挥部混进不少保守组织，也于1月13日宣布退出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至此，山西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和最大的学生造反组织，山西最有影响的两个大专院校的学生造反组织都与刘格平和总指挥部结下了不解之怨。

同日同时，在山西文革的另一端，工人联合会、太原市红卫兵纠察队及红卫兵团也在商量如何应对“一·一二”夺权。工人联合会、太原市红卫兵纠察队及红卫兵团虽然是保省委和卫王王的，但是也是受共产党多年正统教育的，也是一心跟毛主席走的，也是坚决革命的。在保省委和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发生对立时，他们也是会按毛主席指引的路线走的。只不过张志安、刘普德等人认为，“一·一二”夺权是右派夺权，是“反革命政变”。这就出现了保守派和红联站这样的造反派看法竟然如此接近的情况！

于是，工人联合会、太原市红卫兵纠察队及红卫兵团立即成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在当日仿照上海革命造反派的作法，在湖滨会堂举行了“抓革命、促生产，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会，在会上批斗了卫王王等山西省委领导。这次大会被总指挥部和红联站、工人兵团等造反派看作是“假批判真保皇”的大会。但是新华社山西分社采编副主任李希孟给予了报道，并称之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会后联动的队伍进行了大游行。张志安等人拟采取与红联站相同的措施，准备派出代表赴京请示中央，

汇报山西“反革命政变”严重情况。

13日晚上，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下属各组织的代表1000余人在省委礼堂集会表示坚决支持“一·一二”夺权。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陈守中在会上讲话，表示坚决和造反派站在一起，夺走资派的权。

1月14日 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一号通告》，全文如下。

### 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

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史无前例的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造反。要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就必须一反到底，彻底打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

山西省委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毛主席、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几年来，他们秉承其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旨意，企图把山西搞成一个在中国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战略根据地。

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更是积极地推行和发展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派进行疯狂的反革命围剿，把大批革命闯将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伸手派”、“野心家”，企图扼杀山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就是这一小撮混蛋，亲自纠集了大小特务，建立了秘密情报网，安放窃听器、派出特务，专门刺探各革命组织的动向，把其划成一、二、三类，并把其领导成员登记造册，以便不久的将来好下毒手。

就是这一小撮混蛋，把大批黑材料放在省委各部内，至今拒不交出，猖狂对抗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和中央补充规定。

就是这一小撮混蛋，在省人委某一楼内建立了一个地下黑司令部，天天云集其中密谋行动。

就是这一小撮混蛋，组织了一些保皇团体，公开与革命造反派拼命捣乱。等等，等等。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山西广大革命群众向这一小撮混蛋及其卖力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了强大攻势，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文化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一小撮黑帮分子，为了挽救其灭顶之灾，采取了更毒辣的手段——经济战。他们拼命给一些组织大量房屋、汽车、经费，某些单位的钱像流水一样成千上万地淌出，近几天更是达到不可控制的地步，严重破坏了山西的财政经济和腐蚀了革命组织。

在他们的怂恿或操纵下，最近不断发生大规模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革命造反派，甚至发生武斗的现象。大量工人不断出外“串连”。

狗急跳墙，前些天他们甚至不惜挑动上万工人围攻革命造反派，以致许多企业停工，严重影响生产，甚至造成骇人听闻的交通事故等。



革命的同志们！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了新的转折点！为了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为了保证山西省文化大革命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我们二十五个革命造反组织召开了联席会议，一致决定成立“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并立即投入战斗。

我们庄严地宣布：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自即日起由本指挥部接管。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我们于元月十二日夜夺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 and 抄了一些坏蛋的家，搜出了大批私藏的枪支、弹药和黑材料，彻底捣毁了反党分子的巢穴。这个反造得好！好得很！

我们大声疾呼：

一、所有的工人、农民和干部都要牢记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照常上班生产。我们革命造反派们更要在积极造反的同时，坚持生产岗位，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任务，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机器。凡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和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者，就是现行反革命，立即由公安部门依法处理。任何群众组织、任何人不得动用武器、弹药和泄露国家机密，违者依法查处。

三、鉴于前一段贪污浪费之风大盛，勒令山西省文革接待站自即日起冻结流动资金，停止发放一切车辆，并进行调查和调整。除必要的正当的经费外，各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的流动资金自即日起一律冻结，由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联合监督财务机关执行。

四、上述各条，希各革命组织广为宣传，协助执行。凡有违反上述各条者，由有关部门协助我们以破坏文化大革命查处。

打倒折衷主义！打倒经济主义！决战刚刚开始，胜利就在前头，我们的决心下定了，为了真正捍卫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是牺牲我们的生命也在所不惜！我们深信，在今后的革命斗争中，我们的队伍必将发展壮大。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革命的造反派们，一切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

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

附：总指挥部参加单位名单：

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

山西革命造反兵团

山西革命工人野战兵团

山西工农商学革命造反总部  
山西省红色造反者联盟  
山西医卫革命造反总部  
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太工永红战斗队  
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捕猎大队  
山西革命干部造反兵团  
北航播火兵团  
北农机“全无敌”纵队  
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  
山西体育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团  
山西日报革命造反军  
山西东风革命造反兵团  
太原市小学教师革命造反联络总部  
共青团山西省委机关大无畏战斗队  
中共太原市委机关红旗战斗队  
太原革命造反司令部  
晋京革命造反大军  
山西反修兵团  
山西红色革命造反联盟  
山西农民造反兵团  
山西“延安”文艺兵团

该《通告》由赴晋大队邢晓光起草，由刘格平修改后发布的。《通告》中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一是宣布“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自即日起由本指挥部接管”；二是提出“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前者应该是全国第一次公开地正式地宣布夺权，比上海《急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要深刻得多；后者则是革命时期的口号，有点“十月革命”时期“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意思，在稳定之后执政者绝对不会也不允许再提这样的口号。

签署《通告》的群众组织有三类，一类是保袁振的老造反派组织，如兵团、决死纵队等；一类是红联站和与红联站联系密切的老造反派组织，如红联站太工永红、捕猎大队及太原市委红旗等，捕猎大队实际上是红联站住省委（有说是住在刘贯一家的）的一个小分队，由冶校东方红、太工红旗等组织的人员组成，也就是“十几个人、七八条枪”；还有一类是刚成立的组织，其中不乏保守派组织（其实造反派和保守派是相对的，也是变动的），如东风兵团就是原省委保守组织“全球红”在1月9日改名而成，打起反卫王王的旗号，成为刘格平的“御林军”。

同日，红联站开始调集队伍，进驻山西日报社、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太原电讯局、山西省公安厅等部门，准备进行夺权。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山西联动 13 日举行大会的消息报道,工联、红卫兵团等组织受到极大鼓舞,以此表示反对“一·一二”夺权的正确。但红联站、工人兵团派人到新华社山西分社造反,还派人到北京新华社要求予以更正。后陈伯达出面干预,新华社在 16 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更正”,称:“在元月十四日有关太原问题的报道中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应予撤消。”

同日,上海有一个很不显眼的,也许连上海人也搞不清楚的工人造反派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第八司令部(简称“工八司”),搞了几卡车人,直接开进康平路的上海市委大院,贴出大布告,宣布夺了上海市委的权。乱了几个小时,徐景贤按张春桥、姚文元的指示,用电话喝散了这场小丑般的夺权闹剧。

### 夺权、夺权、再夺权

在山西“一·一二”夺权后,在省城太原明显形成了三股势力,即总指挥部下属的兵团、决死纵队等组织的势力;红联站、工人兵团等组织的势力;工联、红卫兵团、百万雄师、山大八一四等被认为是保守组织的势力。相对而言,比起后两种势力来,总指挥部的势力反而要弱一些。由于红联站像首都三司一样,派了许多人员到各地市播撒文革火种,在山西各地市红联站和工人兵团势力要大得多。在 1 月的中下旬,三股势力的夺权、抢权、反夺权的斗争进行得特别激烈。

在上海,由于保市委的工人赤卫队在 1966 年 12 月 29 日的康平路事件中被工总司打垮,那里的夺权已经是造反派之间的争夺了。

1 月 15 日 凌晨 3 时半,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简称“上三司”)联合工总司二兵团,调集队伍进驻康平路市委大院,宣布夺了上海市委的权,并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发电,声称上海已经夺权,请示中央承认,并提议张春桥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为上海第二书记兼副市长,请求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后由张春桥亲自做了工总司二兵团头头耿金章的工作,次日工总司二兵团撤出上海市委大院,这次夺权流产。

同日,已经完成山西省夺权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太原五一广场召开斗争卫王王等省级领导大会,会上采取了拳打脚踢、坐“喷气式”等方式。其间,工联、百万雄师、山大八一四等组织开来大批人马冲击会场。冲会场的组织用广播车上的高音喇叭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以扰乱批判发言,并冲上主席台“保卫首长安全”。在批判卫恒等人的大会后,“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太原机械学院第四野战军的负责人趁乱之机率人把卫恒、王谦、王大任、贾俊挟持到上兰村太原机械学院。第二天,机械学院的造反派围攻卫恒。卫恒进行驳斥,并称:刘格平、刘贯一、袁振等人所写的大字报,是政治迫害。他们五个人的底子我们清楚,他们掌权不如我们掌权。现在我还是省委第一书记,要对中央和山西人民负责。你们把我软禁在这里是非法的,赶快放我,我要大摇大摆回省委去办公,可是造反组织成员对他的这番话毫不理睬,坚持要卫恒交出整群众的材料。”(《文革“全国第一夺”——山西“一·一二”夺权概述》)

同日,红联站派人赴京再次向中央文革请示汇报。中央文革在 15 日、16 日、

17日连续三天接见红联站人员，指出应大联合向卫王王夺权。

同日，太工红旗发表《再告全省人民书》（简称“二告”）。至20日又连续发表《评总指挥部一号通告》、《二评总指挥部一号通告》、《三评总指挥部一号通告》（简称“三评”），继续深化论述“一告”的观点，对刘格平等人提出怀疑。

同日下午，工联、百万雄师、山大八一四、工人红卫兵总部等组织在太原饭店开会，成立了“山西红色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总司”），以对抗总指挥部。

同日晚，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太原市迎新街的一个学校召开下属各组织负责人会议。刘格平、刘贯一、袁振、陈守中等人在会上介绍各自的个人简要历史情况及“受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迫害”的情况，再次表态“一定与革命造反派同生死共命运”，企图消除社会上传扬的对他们的种种不利说法，以便进一步取得造反组织的信任。（《文革“全国第一夺”——山西“一·一二”夺权概述》）

**1月16日** 红联站、工人兵团联合召开斗争卫王王大会，再次受到工联、百万雄师的冲击。

同日，省委书记处书记赵雨亭在太原新民东街六号给参加省委二线工作的柴守约打电话说：“刘格平、袁振他们夺省委的权，我们不能交权。啥时候中央有了指示让交才能交。”同时，赵雨亭还给各地、市委的负责人打电话说：“省委的电话随时可能中断。如果你们和省委联系不上，就依靠中央的‘十六条’，独立思考，独立工作”。并称：“现在的情况和战争时期差不多。在第一线的被冲垮，第二线的要顶上。根据实际情况处理问题。总之，不能影响了工作”。当时，正在孟县主持召开全省计划工作会议的副省长刘开基也在会上说：“刘格平、张日清、袁振等人在太原发动了政变，我是做农村工作的，准备上山打游击。”

同日，刘格平、刘贯一、袁振、陈守中等人联名向中央及中央文革小组报送了一份关于省委的材料，标题是：《关于卫恒、王谦等人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向中央文革小组并中央的报告》，罗列了山西省委领导人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十二大罪状”。称省委“成立了地下黑司令部、设立了黑据点，在组织上准备和安排了应变对策”。还说：“赵雨亭、武光汤、郑林、焦国鼎、刘开基、胡晓琴、史纪言和副部长以上的大多数干部转入地下，正以全部力量向革命群众和革命左派反扑，成为山西广大革命人民的公敌”。（《文革“全国第一夺”——山西“一·一二”夺权概述》）

**1月17日** 凌晨，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以及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总指挥杨承孝、红联站总勤务员杨保明等人在刘格平宿舍开会，策划接管省、市公安机关。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在给中央和中央文革的一封电报中说：“山西省公安厅、太原市公安局现在完全掌握在省、市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已经成为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御用工具，来反对革命左派队伍。现在革命群众已经包围了公安厅、公安局。我们的意见请中央考虑迅速下令，由山西省军区接管。”会后，红联站立即宣布夺了省公安厅和市公安局的权，张日清到场祝贺，刘格平向中央电话报功，总指挥部表示支持。

从14日到17日，红联站和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还夺了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山西日报社、太原晚报社以及太原市电讯局的权，总指挥部曾致信祝贺。

同日，中央文革成员关锋在北京接见山西省的群众组织代表，指出卫王王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肯定了山西夺权是正确的。参会的工联、山大八一四的代表立即把中央文革的精神用电话传回太原，提示本组织“赶快联合夺权”。当天中午，工联、山大八一四等组织联合组成的红总司，突然袭击已经由总指挥部夺权接管的省人委机要室，进行反夺权。“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和“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两枚大印落入其手。同时山西省交通厅等单位也被突袭，五枚大印被抢。

同日，总指挥部发表《紧急通告》，“强烈谴责卫恒死党指使山大八一四等五个组织的部分人反夺权的反革命行为。”随后，工人兵团、决死纵队紧急调集万余人进行反击，省人委的大印传说已经夺回，但最终失落在了工人兵团或决死纵队手中。

**1月18日** 红联站按“联合夺权”指示，串联工人兵团、矿山烈火（山西省七大国家统配煤矿之一的西山矿务局的造反派组织）、太重红旗（太原重型机器厂的造反派组织）、首都三司驻晋联络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天津大学八一三等二十几个革命组织，筹备成立一个联合的革命造反的总指挥机构。筹备会前，红联站与总指挥部打了招呼。红联站还征求了刘格平的意见，刘格平表示支持，并答应在各组织联席会议上讲话。在联席会议上，刘格平表示：“你们可以成立第二指挥部，同总指挥部并肩作战”。会议决定，成立“红色造反总部”（简称“红总部”），并发表了成立宣言。

同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红联站、工人兵团、山大八八红旗等组织在16日召开批斗卫王王大会的报道。

**1月20日** 在大同，工人兵团大同军团、红铁军（大同的造反派组织）、太工红旗驻大同小分队夺了雁北地委、行署和大同市委、市人委的权。

同日，在忻县，工人兵团忻县军团等组织夺了忻县地委、行署的权。

同日，在阳泉，工人兵团阳泉革命造反司令部夺了阳泉市委、市人委的权。

**1月22日** 在上海，“上三司”第二次进驻康平路市委大院，宣布全面接管上海市委。晚上，“上三司”领袖、上海戏剧学院学生赵全国被工总司为首的造反派头头们以“破坏大联合”的罪名扭送上海市公安局。这次夺权宣告破产。

**1月23日** 山大八八红旗、工人兵团出动万余人协助其下属组织太原纺织厂红卫兵进行夺权，受到太纺另一组织红卫队的阻挠，并发生冲突，最终夺权成功。由于太纺红卫队是中央文革成员关锋所支持的，山大八八红旗等组织贴出了炮打关锋的大标语。

**1月24日** 上海最大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调集了十几个院校的红卫兵队伍分赴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市人委及十个区委、区人委等二十三个机关夺权。红革会发出通告，宣布夺取上海的一切大权，并通知上海警备区派军队保护“左派”夺权。红革会

邀请另外三大组织工总司、农总司（筹）及市委机关联络站，商谈共同掌权事宜。未果，后经姚文元出面说服红革会把所有印章交给了上海警备区保管，此次夺权又告破产。随后1月28日红革会总部因炮打张、姚被中央文革点名而垮掉。

至24日，太原各基层单位的夺权进行得如火如荼。

红联站所属的山西医学院红革联，十中七一，省委党校东方红，三中红旗，太原工学院红旗、井冈山、东方红，山西农学院火炬，山西财经学院东方红，山西林业学校造反有理，四中前卫，太原铁路机械学校东方红，山西会计学校井冈山，太原冶金工业学校东方红，山西化工学校造反团，八中东方红，十二中东方红，太原第一机械技工学校八二，山西大学附中八一八，十五中红旗，太原钢铁公司中学红旗，太原重型机器厂技工学校东方红，太原铁路局第一中学燎原，九中造反团，十三中红旗，山西矿业学院红矿工，山西劳动大学红旗，十八中反帝反修，太原机械学院红旗，太原重机学院东方红、联总都先后在本校夺权成功。

同时，工人兵团所属太原钢铁公司联合总部，太行仪表厂司令部，山西机床厂机床烈火，大众机械厂红旗，太原铁路局红旗等都先后在本单位夺权成功。

同时，山西大学八八红旗，兵团所属五中井冈山、十二中红旗、山西建筑工业学校二一七、一中赤色、六中32111，团省委大无畏，小学教师黄河，山西省艺术界革命造反指挥部，太原市委红旗等革命造反派组织均夺权成功。

同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表明中央对山西“一·一二”夺权的支持。当时在京反映山西情况的红联站负责人段立生等人，在听到广播后，知道了中央对山西的态度，立即返晋商量对策。

### 夺权尾声，也是反夺权的开始

1月2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并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社论指出：“这是继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胜利以后，在一个省的范围内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夺权斗争的伟大胜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社论还指出：“山西省军区和人民解放军部队，坚决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毫不含糊地全心全意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起来夺权，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社论又指出：“山西省的革命造反派，为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创造了新的经验。”“山西省军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为全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树立了鲜红的旗帜。”社论最后说：“山西省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一切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一切革命同志，都应该热情支持他们的夺权斗争，大力宣传他们的夺权斗争经验。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态度。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面前，站在后面指手画脚是错误的，站在旁边冷眼观望也是错误的。”

《人民日报》社论即中央的表态，大长了刘格平及总指挥部的士气，大灭了

工联、百万雄师等保守派的威风，也使得发出“三评两告”的老牌造反派太工红旗进退维谷，使得退出夺权的山西大学八八红旗及工人兵团很没面子。虽然红联站当时拒绝参加总指挥部，但并没有与刘格平翻脸，并一直与总指挥部配合行动，这就为红联站被迫暂时扭转风向留下了回旋余地。但是反对夺权的造反派组织，无论是山西大学八八红旗及工人兵团，还是太工红旗及红联站，都到了一个历史的坎儿上。工人兵团有点像一座巨大的冰山，遇到大热天很快就冰消雪融了。而红联站虽然好像有一阵子加入了总指挥部，后由于“道不同，不相为谋”，终与刘格平和总指挥部分道扬镳了，并且成了他们的强劲对手。

同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太原五一广场召开“革命派大联合夺权誓师大会”。大会由杨承孝主持，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袁振、陈守中坐镇大会。刘格平在讲话中表示“坚决和革命造反派奋斗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张日清代表驻山西的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宣布：“坚决支持革命群众和革命造反派，如果你们需要部队支持，我们立即派出部队，支持你们，援助你们。”还称：“我们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我们坚决进行还击。”在会上，红联站代表发言，提出申请加入总指挥部的要求。同日晚，刘格平向红联站开出“只有开除太工红旗，才能加入总指挥部”的条件。

同日，在长治，“联字号”（拥护劳模李顺达的晋东南的造反派组织）和红联站等造反派组织，对晋东南地委和行署夺权成功。

**1月26日** 山西省军区和21军指战员在五一广场武装集会，支持“一·一二”夺权，刘格平、刘贯一、袁振到会讲话。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游行。《山西日报》为此发表题为《敌人不投降就叫他彻底灭亡》的社论。

同日，在临汾，晋南大中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二司令部、职工革命造反兵团、红联站向晋南地委、行署夺权成功。

同日，总指挥部派出人马，由山西省军区配合，奔赴山西人民广播电台进行反夺权，宣布红联站夺省广播电台的权是非法夺权，从即日起，省广播电台由总指挥部接管。并用武器把红联站及赴晋大队人员逼出了省电台。

同日，省军区派出数十辆汽车，满载全副武装的部队，支持以劳动模范解悦为首的太纺红卫队进行反夺权。并宣布此前已经在太纺夺权的工人兵团下属的太纺红卫兵是“反革命组织”，其“夺权是非法的”，并逮捕厂党委书记杨丕夫、厂长梁俊华、副厂长兼总工程师贾玉琦、太纺红卫兵领袖及其主要成员一百零二人（据杨丕夫夫人张美玉《杨丕夫被抓捕迫害死亡的情况》一文所述）。

同日，太工红旗由于中央表态支持“一·一二”夺权，被迫就反对“一·一二”夺权发表“三评”、“两告”等问题，在太原五一广场“向毛主席请罪”。李青山是这样描述当时情景的：

《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一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参与夺权的人马精神大振，立即欢呼雀跃。同时，轰击太工红旗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而来，说太工红旗反对夺权罪该万死；有人揭发，在夺权的时候，走投无路的卫王王在北营仓库曾议论要投奔太工红旗，这表明太工红旗是“假造反，真保皇”。红旗战士

实在气愤不过，在太原工学院电机馆前的马路上写下大标语：“青山不老，红旗不倒”，被对立面大做文章，说这是吹捧太工红旗的坏头头李青山。山西军区的部队到太原工学院武装示威，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放出话，红联站不开除太工红旗就休想参加总指挥部。太工红旗遭受到空前的压力。

面对这种形势，太工红旗首要的工作是应当立即到五一广场去向毛主席请罪，向社会承认错误，表明痛改前非的决心，这是上海反对张春桥、王洪文夺权的一派开的先例；其次是应当立即整风，找出错误根源，痛改前非，争取得到刘格平和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谅解和接纳，以便在他们的领导下，继续紧跟毛主席干革命。

可是我想不通，不知道究竟错在哪儿。在那种情况下，怎样做才能避免犯这种错误？难道我们遵循毛主席关于“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的教导去考虑问题错了吗？难道我们为党负责，为文化大革命负责，积极向中央反映情况错了吗？

无奈之下，队部决定由队委王步祥率领红旗战士到五一广场向毛主席请罪。

由于请罪不是由我带队进行，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大为不满，它们的下属组织贴出大标语，说太工红旗是假检查真顽抗，几次请罪都不能过关。

社会上广大群众对太工红旗也非常关心，他们当然不希望这个山西响当当的造反派垮下去。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司令刘灏，在汤建忠（山西广播电台干部，人称他为兵团“汤高参”）的建议下（引者注：为连接本句，以上四字由引者添加），到工学院找到我，要我们和他们一起干，我完全明白他的用意和他对形势的估计，但是我婉拒了他的好意，因为我不能无缘无故脱离我们亲手建立的红联站而作它投。不过，我和刘灏、汤建忠成了好朋友，在文革中，经常在一起研究形势。

由于太工红旗在造反派中有着巨大的影响，虽然太工红旗有反对夺权的“三评”、“两告”，刘格平最终并没有敢把太工红旗打成“反动保皇组织”。

1月27日 山西省核心小组和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召集原省直机关各部委副部长以上干部开会。刘贯一在会上训斥与会人员说：“如果你们不揭发黑省委的问题，我们就开公审大会审判你们。”刘贯一指着胡晓琴（时任中共山西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说：“我给你指一条出路，就是揭发安子文的罪行。”接着又指着卜虹云（时任山西省委文革办公室主任）说：“你是省委的大特务，必须老老实实交代你们的特务罪行。”

1月28日 太原市革命委员会成立，陈守中担任革委会主任，王承琚（市委红旗负责人）担任副主任。当时毛泽东还未有关于“革命委员会”的指示，太原市“发明”出“革命委员会”这个名称，成为“全国第一革”。2月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对此进行了报道，同时表达了认可和支持。文中指出：“我们毅然决然地在打碎反革命修正主义统治机构的废墟上，建立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崭新的权力机构——太原市革命委员会。”“太原市革命委员会，现在负责行使太原市党、政、财、文等各种大权。”（引自《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正行



使大权的开端，太原市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决定乘胜前进全面夺权，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抓革命促生产，坚决进行斗批改》，《人民日报》1967年2月6日，第3版）

在此顺便提及的是，1月22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的夺权、1月25日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2月20日改称“革命委员会”）的夺权、1月31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委员会（2月23日改称“革命委员会”）的夺权、2月3日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2月23日改称“革命委员会”）的夺权，都被许多史料讹传成了“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同日，刘贯一代表山西省委核心小组向中央汇报夺权情况，其中提到红联站时认为是“机会主义者组织”。

同日，太工红旗冒雪在太原五一广场再次“向毛主席请罪”。

**1月30日** 凌晨，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在总指挥部的关押中，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突然去世。按杨顺科、李玉明撰写的回忆录《卫恒之死》叙述，卫恒从1月18日起，就被造反派关在山西省团校。在1月22日被决死纵队和兵团揪到晋中榆次体育场批斗后，被兵团的女领袖、山大八八红旗的王清英转移到了山西荣军疗养院。深夜又被转移到设在太原市迎新街的决死纵队总部关押。29日又移至迎新街的十三冶三公司办公楼310号房间关押，次日晨去世。至于卫恒去世的原因，当时核心小组刘格平等五人给中央文革小组转党中央、毛主席的加急电报中是这样说的：“原省委卫恒十一日畏罪自杀”（引者按：如果《卫恒之死》引用的资料为真，不知刘格平等人为何把卫恒去世之日提前了十九天）。省委第一书记之死非同小可，之后，曾把卫恒的有关脏器和胃内容物送至上海卫生局和人民检察院法医检验所进行检验，得出“出血性胰腺炎导致休克突然死亡”结论。至1967年5月，由北京市公安局、中科院实验医院研究所、卫生部药物生物制品检定所、人民解放军总后卫生部药品检验所等单位得出的卫恒死亡结论是：“死者卫恒符合于出血性胰腺炎导致休克突然死亡”。不过，这些结论只是对样品负责，并不能完全说明卫恒的死因。所以，卫恒死因至今是个谜。

卫恒去世不久，王谦、王大任等省领导被投入监狱。与他们有工作往来的一大批工作人员也被打成“特务”、“黑二、三线人物”关进监狱，在押时间有的竟长达两、三年。杨承孝这个不是共产党员的山西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总指挥，竟然在大会上宣布开除卫恒、王谦、王大任等省委领导人的党籍。在当时的革命时期，省委都被称为“黑省委”，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人人得而诛之，开除党籍这样的小事，由杨承孝宣布就不足为奇了。

同日，经刘格平同意，其夫人丁磊组织了以东风兵团为主的六百人“造反大队”（由三百名学生、二百名工人及一百名干部组成）分赴五专三市（当时山西省行政区划为五个专区和三个省辖市，即雁北专区、忻县专区、晋中专区、晋东南专区、晋南专区、太原市、阳泉市、大同市）进行再夺权或反夺权。

同日，红联站在山西省体育馆召开整风动员大会。

**1月31日** 晋中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红联站及赴晋大队等造反派组织，在

晋中军分区和驻晋中部队的支持下，一举夺了晋中地委、行署的权。

同日，红联站内部整风，在中央指示和刘格平双重压力下，被迫决定把红联站的创始组织太工红旗开除出红联站，杨保明的总勤务员的职务被罢免，并选举山西省委党校东方红的赵凤田为总勤务员。

1月下旬，在《人民日报》刊载《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及发表相应社论后，趾高气扬的刘格平终于拿起了“革命的屠刀”左右挥舞。刘格平的“左一刀”砍向了工人兵团和山大八八红旗。工人兵团和山大八八红旗在夺权的关键时刻退出的行为，无异于“叛变”。“叛徒”比敌人更可恨！刘格平、丁磊在1月25日策动了工人兵团的“内部政变”，先后逮捕了工人兵团的主要领导人张建国、李宝顺、张锦秀等人，不久工人兵团就“树倒猢猻散”了。山大八八红旗则因为“炮打关锋”，被视为反动组织（3月10日被宣布成反动保皇组织），其领袖之一的方培泉等人被捕。刘格平的“右一刀”砍向了工联、百万雄师及红卫兵团，立即宣布这些组织为“反动保皇组织”，并陆续把其领袖张志安、刘普德等人缉拿归案。

---

【史林一叶】

## 震惊各方的山西长治“一·一六”事件

赵瑜

按：本篇摘自赵瑜著长篇报告文学、反映文革中晋东南大规模武斗的《牺牲者》第十一章，原题为“伏击在元月十六日”。文中提到的晋东南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一派叫红字号，其所属组织名称大多带有个“红”字，虽被一些人视为“老保”，但却靠上了省城最大的造反总指挥部，得到省革委主任刘格平和著名劳动模范陈永贵等及驻晋空军、海军部队的支持；另一派叫联字号，建立了地、市两级造反总指挥部，以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为代表，得到省革委副主任、省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和晋东南军分区司令员武天明等及驻晋陆军部队的支持。当其他地方的群众组织都称这派那派的时候，晋东南却偏偏称为“字号”，赵瑜对此有个说法：这是“别开生面，令人想到了悠悠晋商辉煌创业的传统称谓”。



（右图：赵瑜近照）

作者赵瑜，著名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中长篇报告文学作品30余部。《中国的要害》《太行山的断裂》《强国梦》《兵

败汉城》《马家军调查》等均曾引发社会大讨论，影响深远。2007年完成的长篇报告文学《牺牲者》，因属“敏感”题材，至今未能出版。此后还著有《寻找巴金的黛莉》《王家岭的诉说》等。多次获得文学大奖，作品译行国外。是中国纪实文学代表作家之一。

1967年北京“十二月会议”后，69军谢振华军长主持山西支左，要强力推进“十五条”硬性措施，坚决依靠省军区和各地军分区，一统三晋河山。而晋东南红字号携同全省本派将士，偏要在逆境中抗击到底。顽石顶撞铁锤，火星迸飞，没有余地。

上党百姓，饱尝日寇侵略之苦，历经国共内战之累，均不至于落到如今大逃亡地步。文革战火，却使他们倾城弃舍，四处奔逃，饱经离乱啊！毛泽东多次制止全国武斗都不见成效，北京开个会，同样不能熄灭晋东南仇杀之火。红字号将士孤注一掷，越战越勇，誓以更大规模的军事冒险对抗联字号的政治谋略。

1968年元月16日晚，红字号武装在上党古城打了一场大硬仗，获得全胜。联字号李顺达及4546部队团首长等一百多位联字号新政骨干、核心人物，全部被俘，酿成重大事件。

红字号认为：半年前，中央七月会议解决山西问题，毛泽东批“照办”，省里发出《纪要》，刘格平亲临太行支持程首创，贯彻“红七条”，却遭到联字号坚决抵制，还抓捕了程首创本人，查封了地区革命委员会。而今，我们红字号为什么不可以同样这么干？“你们单方面做出决议，便让你们单方面来执行！”让你们单方面来晋东南啃一啃硬骨头。

## 医专激战前后

请看长治市区进入1968年元月后的两派武斗日程，注意，这里仅仅是指长治周边，不包括全专区各县的战斗：

元月1日，红字号在前一天攻克联字号手管局据点，战死2人，击毙联字号1人，击伤多人，俘虏50余人；继而在本日下午，包围攻打联字号市建联总大楼，重炮轰击，未克；同日，联字号反击东街派出所，打死红字号2人，打伤多人。

元月2日，红字号袭击地区财政局，抓捕联字号3人。

元月3日，红字号首次攻打联字号医专红总司大据点，发射120重炮98发。联字号死2人，重伤4人，坚守不退。

元月4日，红字号持续炮击医专。当日抓获联字号粮机厂头头徐公达，旋在西招指挥部将徐打死。同时对长治北部城区实行武装戒严。

元月5日，红字号以一部兵力，在炮火支援下，袭击地区和平医院，同时出动六支武装分队，第二次攻打联字号市建联总大楼。从是日晚8时开始，打到6日下午5时，打死联字号守军2人，攻占大楼。大部联字号人员从地道撤出。

元月6日凌晨，红字号两支武装分队攻打联字号太行农校，打死联字号战士

3 人，重伤数人，联字号被迫撤离该据点。

元月 7 日，红字号于下午 3 时，包围攻击联字号驻地委党校总司令部。据这一天死亡名单载，长运一位副经理被打死，红字号专建门前打死 1 人，地委东招待所门前打死 1 人，八一饭店门前打死 1 人，平民惨遭乱枪射杀。

元月 8 日，持续炮击联字号医专据点。同日，太行中学一名联字号被手榴弹炸死；晚，红字号再次炮击地委党校总司令部，炸死 1 人，伤 3 人。

元月 9 日，持续炮击联字号总司据点。

元月 10 日，持续炮击联字号粮机厂据点。

元月 11 日，联字号伏击海军运粮军车四部，击伤一人，劫获军粮小米 46000 斤；同日，红字号以重型大炮轰击联字号医专据点。从夜 8 时至次日凌晨 2 时，持续 6 小时之久，共发射炮弹 680 余发。炸毁联字号据点防御工事多处，炸伤多人。同日晚，红字号老刘满水等部出兵袭击平顺县，联字号死 2 人。

元月 12 日，联字号大批人马攻打北郊红字号太行锯条厂，开炮近 700 发。前述联字号用铁丝把海军战士捆绑起来，当做掩体向红字号进攻，便是这一仗。

元月 13 日，联字号粮机五分团劫持海军军车一部，俘获海军战士 19 人。然后扒去其军装，由联字号武装人员穿上，开上这辆军车，突袭红字号缝纫机厂据点，打了红字号一个措手不及，造成严重伤亡。

元月 14 日，红字号里应外合袭击地区邮电局，劫走全部战备电台、报话机，用以加强通讯指挥装备。

元月 15 日，红字号从南面、东面、北面，调动强大兵力，再次向联字号红总司医专据点发起攻击。

这一天，红字号赵震元、郝振祥、王七孩、杨万胜、侯小根等将领全体上阵，协同作战，从凌晨 6 时起向医专猛烈炮击，停炮后展开地面进攻。医专据点距离西部军分区很近，即人们说的“一箭之遥”，联字号据点成为军分区的屏障。

联字号据守医专司令王法书、作战部长班万红，率精兵强将，顽强抵抗。凌晨红字号炮击打响，联字号各分队指战员井井有条钻入地道或主楼一楼内躲炮，待炮声稍缓，即杀至战斗位置。抗击来犯之敌。

红字号战斗人员按计划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同时向医专发动进攻。

医专南部屏障和平医院，平时由医院联字号组织护卫，抵抗红字号淮海厂方向来敌，延缓红字号进袭司令部步伐。今日血战未能守住。红字号老刘满水等大批武装队员占领医院，继续向北攻击，一直突进到医专南墙停止了脚步。原因是遇到了医专大操场开阔地，知是雷区，不可贸然前进。同时看见操场上布满了红字号自己连日打来的未炸响的炮弹，“像玉米茬子地那样”，也不敢轻易穿插前进。于是，红字号队伍在南墙处建立机枪及小炮阵地，频频向教学主楼射击。策应北部战斗。

医专北部屏障是地区印刷厂，王法书持冲锋枪，亲率部下顽强抵抗，利用工事、厂房等地形地物，与红字号打得惊天动地，联字号战死二人。打到半截，王

法书背下一名伤员。他后来跟我说：“伤员的血顺着我脖子往下灌。”跑回主楼放下伤员，王法书旋即从西部奔向军分区，他浑身是血，直接跑到了分区武天明司令员家中，请求分区火速出兵增援，或者下令全体守军撤退出医专。

这时候，联字号另一名巨头——长北五四兵团徐志有，正在分区里头。老徐对我回忆说：“他妈的，红字号在医专那边打到下午了，王法书冒着炮火跑回分区来，大喘气说，医专快顶不住了，请示分区首长可否从西面正门突围，首长严令指示说医专决不能丢，法书可以休息一下，即命我带领一支军人队伍，穿便衣，迅速杀回医专增援坚守，并由我接替法书指挥。王法书马上派出他的一名警卫员，跟随保护我，还特地给我写了一个命令，上写医专诸战友必须听从老徐全权指挥。老赵啊，我要说法书老兄那天算半个逃兵，他肯定没话讲！当时老子二话没说，揣上一纸命令，端起冲锋枪，带着周军等弟兄向医专跑步前进。到医专大门口工事那里，见一个战友仰面躺在地上，已经牺牲了。我们顶着炮火冲回医专主楼。我立即给大家鼓劲儿，要茂海、天池、老班等人坚决顶住。正说着，而红字号的改装坦克从西面正门撞了进来，咣当咣当把铁大门给冲垮了，主楼阵地几挺机枪立即向坦克扫射，子弹打在坦克钢板上，叮叮当当的，火星四溅，但不起什么作用，我立即命令，发射四零火箭筒，那玩意儿本来就是打坦克的！不巧火箭筒炮手正在北侧战斗，等到火箭筒战士跑步前来时，那坦克，不知为啥却退了回去，估计是红字号的步兵没有跟进。到现在我弄不清，红字号为什么没有从西面猛攻。就这样，医院、医专、印刷厂三个地点，这天挨了一千多发炮弹，我们在主楼守到天黑，牺牲了四个人，红字号三个方面的队伍总算撤退了。”

我告诉老徐说，我看过材料，红字号那天总攻医专，人家的作战部署，是有意放开西面大门的，南面专区医院、北面印刷厂、东面旧城墙先后都让红字号攻占了，目的在于逼迫据点联字号数百人从西面撤到军分区去，就算拔掉了这个大司令部。红字号跟主楼守军直接交战，却没有打下来。

老徐说：那我明白了，王法书得不到撤出的命令，他只好自己突围到军分区去报告。

我说，你们联字号的指挥系统比较强，没有命令就坚守不撤，真够顽强的，那天晚上，军分区政治部郭首长，亲自到医专第一线去慰问了。他代表军分区召集你们头头见了面，表扬你们浴血奋战的精神，提出向最顽强的周军同志学习等口号，鼓励你们要坚守，还向你们当场赠送了毛主席像章和语录本。当晚还向医专增派了一批摘掉领章帽徽的部队战士，好像有一个连兵力吧。

老徐就笑，说这么内部的事儿，你老赵是怎么知道的？确实是这样嘛，因为市区的联字号据点快让红字号打光了，只剩下了两大组织司令部，再打丢了就只有军分区独家支撑了。医专是分区屏障，一旦丢掉，就把军分区直接暴露在前沿了。许多联字号人马，都住进军分区肯定不好，都撤到长北那边去，长治市就空啦。还不到撤的时候嘛！

我告诉老陈，那天战后，红字号赵震元等人连夜开会做了战场总结，指出郝振祥的南面进攻不够协调，开炮太迟了；驻长运的王七孩炮组也打得不够准，研

究怎样重新组织攻打。如果不是次日发生了“一·一六”事件，医专据点肯定会被持续攻打，双方伤亡将更加惨重。

老徐感叹道，有部队战士进来坚守，他们要打垮医专也难。不过，红字号赵震元和文琪他们，确实很能打仗。从头年12月份到次年2月份前半月，双方交战不分昼夜，我们联字号失利多些。双方都杀红眼了，那日子很苦啊。到2月中旬以后，依靠野战大军的到来，战局才扭转过来，我们配合部队大反攻了。

红字号攻打医专时，南侧地区和平医院里头，联字号医生照例为本派守军实施战地救护。一部分医生们从抗战开始即与军队关系密切，两地距离又近，所以红字号医务人员被打出医院，联字号医生端起枪来组织了护院队，配合守卫医专，抢救伤员，不遗余力。我的老友张中庆他爸，常二毛他爸，都参加了护院队。不论你原先属于哪个科，这阵儿都搞外科救护了。

元月15日上午，红字号攻进医院，护院队的医生们急忙钻了食堂菜窖。红字号将士暂时没顾上收拾这些人。到天黑后，医专未陷，老刘满水等红字号队伍受命从医院向南部淮海厂撤退，还顺手牵羊抢了不少财物。队伍中忽有人问，那帮联字号医生都有枪呢，他们跑到哪里去了？说这话时，一哨人马正好到了大菜窖跟前，便听有人说，会不会藏在这下头？十几位医生们在菜窖里听得真切，黑咕隆咚，谁也不敢吭气，躲没法儿躲，跑没法儿跑，大伙儿惊出了一身冷汗。但听上头红字号头头说，炸狗日的，管他有人没人，丢个炸药包扔下去！说时迟那时快，咕咚一声，即有一个方箱式炸药包扔了下来。导火线“滋滋”地冒着火星。天啊，今日完了！——最不可思议的是，这个炸药包落在医生们脚边，偏偏熄火了，没有爆炸！上头的红字号感到奇怪：咋不响？不行再点一箱。

在此万分紧急关头，远处有红字号头头呼叫这拨人：“快些跟上！到急诊室那边去搜一搜！”这拨人答应着，没有继续实施爆破，小跑步离去了。

菜窖里头，十几位医生躲过了劫难。其中，就有中庆他爸，也不知前世修了什么大德，在必死无疑时刻，捡回了一条命。那种炸药包威力之大，是可以炸塌半座楼的。

急诊室那边，我的发小常二毛他爸，可就倒了大霉。

这位常二毛，就是前头章节里那位：他家菜窖里吊死了卫校老师，二毛不知情，下菜窖时与那尸首打了个正照面，差点儿没把二毛吓死。武斗开始后，二毛他爸妈——两位坚定的联字号，把二毛送回了河南林县老家避难。老爸常医生身瘦力单，却斗志昂扬地参加了护院队，积极为联字号救死扶伤。这天红字号攻过来，本是内科大夫的常医生正在急诊室那边忙乱，未及躲到菜窖中去。天黑后，医专总部枪炮声渐稀，常医生放松了警惕，备感困倦，就地倒在值班室床上，抱着一支精美小手枪，蒙头睡去。红字号兵马恰恰搜查到了这里。见室内有人大睡，厉声命其起身。倒霉的地方在于，常医生熟睡中被吵醒，脑子失去了判断，以为是联字号战友要召唤他去战斗，便猛地一下拔出手枪来，脱口而出：“狗日的红

字号打到哪儿啦？”红字号将士闻言大怒：“老子们打到这儿啦！”常医生立即被缴械，让人家捆了。一连几个大耳光上去，常医生这才清醒过来，始知是红字号人马窜进了此地。他还举着一把精美手枪，分明是个头目嘛！可怜常医生做了俘虏，让人家扔上了撤往淮海厂的卡车，径直押回了红字号大本营。接下来他要受多么大的罪？让我把这个残酷故事讲下去。

常医生特别富有童心，是非常平等民主的一个父亲。我在二毛家里混夜，年轻人胡编乱侃，常医生说一口河南林县普通话，居然毫无怨言地加盟我们阵营，扎堆儿编到天亮。你聊什么他跟你一起聊什么，这在成年人当中真是罕见，有趣之极。我们小孩子往往把常医生当成了同伙儿。到现在，二毛成了国家游泳队教头，和我提起他爸梦中被抓情景，一再模仿“狗日的红字号打到哪儿啦”这句话，我们仍会大笑不止，仿佛在讥笑同伙儿中一位倒霉蛋。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笑谈！

常医生被抓到红字号大本营，让人打得皮开肉绽，活不得死不得。地窖中幸存的医生们悲愤交加，心急如焚，纷纷向军分区呼吁营救常医生。特别是二毛他妈妈，妇科专家路华阿姨，本来就是位急性子，现在更急出一团烈火来。而红字号淮海厂大本营是一个具有强大武装力量的钢铁堡垒，说营救，怎么营救法儿？这真是个大难题。

路华阿姨，后来接生过我的女儿。我操心文革故事，曾向她提起营救常医生的话题。她简略地告诉我说，是军分区让联字号王法书他们把人救出来的，详细情节她也说不清楚，只是说常医生被救出时，已经给打得命若游丝，一动也不能动了，基本上是一死人。

常二毛更不会知道他老爸是如何被救出来的。

问医院许多人，都说不清楚。

早已年迈的常医生自己也弄不清他是怎么出来的。

路华阿姨如今已经去世。幸亏当年我问及此事，她提到过王法书这个名字。2004年我采访王法书，忽然间想起了常医生被救事，便慢慢咨询王法书先生：淮海厂壁垒森严，你们是怎样救出常医生的？王法书却想不起来什么常医生，不明白我要了解哪件事。后来我提醒他，常医生就是路华医生的丈夫。王法书一拍脑门，想起来了。

营救常医生，故事一波三折。如果王法书不讲底细，那情节今人无论如何想像不来。文革战场，啥样儿事也有。

王法书向我开始了回忆：

“你一提路华医生，我想起来了。那天炮声很紧，我们在分区开完会，首长把我留下来，专门交待了这个任务，说和平医院的医生们，强烈要求营救一个被抓到淮海的医生，好像是姓常，首长指示说你们抓紧研究一下，看有什么好办法。开头儿我们没有重视，那时候双方抓走一个人太平常了。据我们侦察，淮海厂红字号大牢，在一座楼里的地下室，里头关着全是联字号骨干，驻着重兵把守，你有特种兵也救不出人来。不料，首长又派人来医专总部催，这才引起我们重视。我向作战部门讲了，看看有什么好点子救人。打进淮海厂救人显然不现实，可首

长逼住我们完成任务，这一逼，真逼出了办法。咋办呢？我们决定，潜伏到淮海厂布防的前沿阵地附近，也去抓他们一个重要人物，再拿他交换常医生。这个方法说着容易，但实行起来难度很大。淮海厂四周地雷密布，壕沟纵横，还有电网、铁丝网。因此，只能在他们出入通道外，埋伏等候，才能抓到人。风险比较大，弄不好就连你也赔进去了。头一回派人，夜里出发去了，冻到后半夜，抓回来一个，他妈逼一审，是个红字号普通战士，不是官，恐怕换不回常医生。我一想，这个人也有用处，就把他先关起来。第二天晚上又去抓。到天快亮时，终于抓回来一个值钱骨干，是个正在巡查外围防线的复转军人。咱的人一大早向我报告，说把那个红字号头头拴在礼堂门口篮球架上了。我说不要打他，给他弄些吃的。因为打坏了他，就不能亲笔写信了。说完我去看了看，那人蒙着眼倒在地上，冻得面色发青，看上去块头也不小。我怕红字号打炮把他炸死怎么办！院子里很危险的。就指示把他弄进楼里来，暖和暖和，让人跟他谈话。把他冻死也不行。那人当时奇怪，为什么不往死里打他。向他说明情况后，他表示愿意给他们总部写信，说明自己当做人质被抓，联字号并没有打他，只是要求与常医生来个交换俘虏。信写好后我看了，继续审讯淮海厂布防情况。然后，把头一天抓的那个红字号战士押出来，告他说要放他带信回去，让他去找首脑，如果同意交换，就抓紧通知我们时间地点，赶紧回信给我们，否则那个复转军人性命不保。交待完了又给他蒙上眼，把他送出去了。

“大概隔了一天，有部下向我报告，说淮海红字号放出一个我们联字号俘虏，带来信了，同意拿常医生与那个复转军人交换。反正他们扣着常医生也没球甚用。信中约好交换地点在南郊护城河桥头上。是淮海厂据点最靠北部的一个哨口。交换时我没有去。按常规应该是武装保护把人带到桥头，然后给俘虏解开眼罩，双方同时放人，各自的人就走过桥去。交换完毕，双方都不打枪，迅速撤回。这件事挺麻烦，前后用了好几天时间，总算为分区和大夫们完成了任务。后来咱和路华医生熟悉了，才知道救的是她丈夫。也没向她细说过程。确实有过这么回事呢。”

我说总算清楚了。不过王大司令你最后不在现场，常医生不是走过桥头的，他已经被打坏了，不能动，双方交换俘虏时，是陪同前去的医生们，用手术车推回来的，回来一顿抢救，人才活过来。这一点我听医院的人和路华阿姨说过。王法书平静地说：“是吗？”

这位常医生，名字叫常谦，现在太原退下来休息。那段恶梦般的经历，想必他终身都不会忘记。狗日的红字号打到哪啦？

王法书他们急匆匆办妥了这件事，转身投入了残酷战场。

## 太原决斗

元月16日发生的大事件，成为红字号、联字号双方战局的转折点。

事件发生前，元月上旬，谢振华军长领衔山西各部队支左集团，在省城太原前阎锡山都督府、现在的省政府大院里，主持解决晋东南问题。大院里最重要的会议室是五号楼会议室。眼下在会议室中央茶几上，竖着一发黑乎乎的大炮弹。



先后有谢振华、刘格平、陈永贵、曹中南、张日清、李顺达、武天明等诸位省市大员，团团围着重磅炮弹观看。此弹有碗口粗，将近一米高，流线型的弹体朝天竖着，放射着阴郁的光芒。那富有力度的弹头，好像随时可能穿透天花板，直冲云天，那滚圆的弹体，又好像憋足了一股子蛮力，随时可能爆炸。

这是联字号星夜急驰送来的红字号武斗证据。是红字号发射出的近万发炮弹中，没有爆响的一发。“请看引信部位的发射痕迹！”联字号代表翻动弹体，指给大家细察，包括淮海厂出厂标号。——此动作相当危险！

侧旁有红字号代表陈洪章等，此时气得脸煞白心跳急。在长治在晋东南，哪里没有双方炮击的证据？太多了，多到无人理睬无人稀罕的地步。然而“烧土离坡红”，联字号把这家伙搬到了省城高级会议室来，竟显得无比扎眼。而红字号却没有想出这个招子。

大型炮弹就这样竖在诸位军政要人中间，随时可能发生爆炸。双方当事人向我回忆此事，无不倒抽凉气，说除了后怕，还是后怕。他们说：没有工兵排除危险，引信未做任何处理，就这样咣里咣当搬到省府五号楼去了，在场人员全是山西高级首脑，这个摸一摸，那个敲一敲，而不少人打过仗，并不是不懂军事常识，却无人感到害怕，不知是何道理？此弹如果引爆，山西文革史不知将改写成什么样子。

谢振华军长凝视着这发炮弹，盯着它，围着它，沉默着，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然后抬起头来，严肃地发话定性：“这是啥？同志们，这是国民党打共产党嘛！”

此话既出，红字号头头陈洪章等人急了，连夜紧急磋商对策，遂立即照此办理。空字 025 部队（空军第十航空学校）当即派出专机夜航，载红字号干练人员，急飞长治，搜集联字号开炮证据。这类东西有的是，次日，一大堆土洋炮弹、引信弹尾、不同型号的炮弹被搬上专机，迅即飞返太原。太原机场早有专车候待，于是接上“炮弹来使”，直奔省府五号楼。转眼间，又是一堆威力巨大的爆炸物堆在了会议室中央半圈儿茶几上，其重量，将那茶几四条腿深深地压入大红地毯。

这几堆炸弹，一旦引爆，足以摧毁整个五号大楼。

局势已经变了，事情已经晚了。红字号此刻就是把一门联字号大炮拉到省府大院，也无济于事。两月前，李顺达找刘格平陈述，回来说，“一言不进，千言没用”，现在反过来，此话可以用在谢振华这里。

此次省核心小组会议，产生了与原先“红七条”针锋相对的“八条意见”，旗帜鲜明，要在驻晋支左部队统一领导下，坚决依靠晋东南军分区及全区军民，打败红字号，彻底解决晋东南问题。“八条意见”以正式文件形式下发，一开头便说，“由于程首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严重错误，使武斗不断上升，以致造成学校停课、工厂停产、商店关门、交通中断、停水停电的混乱状态”，对此，红字号一派当然无法接受。然而不管你是否接受，省核心小组重新安排了接替程首创的晋东南新班子，宣布对程施行隔离审查。

刘格平长叹无言。

事到如今，红字号再无退路。他们支持的首脑程首创仍在石家庄等地漂泊流浪，他们的战友仍在流血，同时他们也仍在重创联字号武装力量。他们不会投降服输，他们自认拥有大批群众，占据了浴血夺取的长治古城，甚至自认已将雄辩的真理握在手中。干革命，有低潮有挫败，有悲伤有牺牲，有暗夜有误解，有动摇有坚定。毛泽东说，“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没有别的出路，只有战斗到底，直至最后胜利……

他们对省府新《八条》，除了抵制，就是战斗，正如数月前联字号对待《七条》一样。

联字号用千辛万苦，用鲜血生命，换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格局。不过，如此有利的政治形势，谁去战火中落实？好形势怎样发展到晋东南去？怎样将《八条》贯彻到太行深处山山水水？——云集省城的联字号首脑骨干，特别是新确定的晋东南核心小组军政要员，包括李顺达等等，总计百余人，如今怎样返回晋东南中心城市去？长治城已被红字号全面武装占领，距太原 250 公里路程，地形险要，路障重重，杀机四伏，险象环生。困境中的红字号做了最坏打算，复仇烈火有增无减，对这样一批“来犯之敌”他们怎会以礼相待？联字号作战参谋们认为，此时回城，凶多吉少，红字号武装完全可能采取剿杀行动。

而我们怎能不回？从北京到太原，一路苦斗为了甚，还不是为了最终掌控长治古城？还不是为了坐稳晋东南江山？不回去怎样坐江山？我们不怕，我们不会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我们必须杀回去！

李英奎副司令员身经百战，足智多谋——联字号有这样的优秀将领亲率人马驰骋上党，必将完成决战使命。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为充分表达驻晋部队支左立场，谢振华特派 69 军一个连兵力、省军区亦派一个连兵力，全副武装，护送晋东南联字号百余人，分乘大大小小 20 余辆军车及客车，联合出动，形成威武车队，于 1968 年元月 16 日上午 10 时启程，浩浩荡荡挺进上党。

69 军连队架起机枪驱前开道，省军区连队压阵断后，李英奎居中统一指挥，烟尘滚滚，一路南进。

### 伏击抓获李顺达

长治红字号赵震元等头头获悉情报，紧急布防，严阵以待。

早在一周前，红字号就总结说，程首创的被动和部分县区失守，与红字号高层的“右倾”软弱有关。现在，誓不能再让联字号杀回来贯彻《八条》。元月 10 日，由空军弟兄提供方便，红字号头头们在太原空字 025 招待所举行会议。陈洪章、王俊杰主持，数十人参加。有行署红字号王干部回忆说：北京、太原的形势急剧转化，部分同志思想上急躁，那次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会上，

郭天聪介绍了武装守卫长治的情况，说过去咱们军事上右倾吃了亏，现在加强了领导，占据了主动。联字号市内只剩下两三个据点了，我军正在继续把他们打出长治去。武器装备方面，也已经装备了一个师。在文祺同志领导下，以淮海厂赵震元为主，杨万盛、傅安荣、郭天聪等人为副，形成了五人指挥部；王俊杰则介绍了北京情况，说海军党委嫌我们过去反映的材料少，以致被动，现在也多了。程首创的国民党问题完全虚假，我们已经派人赴四川等地搞回材料，足以否定联字号假材料。会议提出在省城的斗争落后了，要增强信心迎头赶上。会后当日，红字号 30 余人转赴省体育馆，参加了省城同一派组织“红总站”联合会议，会议同样指出前段时间右倾保守，致使刘格平同志很被动，从明天开始，要求各下属组织立即行动起来，上下结合，全面反击。

一天两次秘密会议，说明红字号的斗争方略决非退却，而是更紧密地与全省同派战友团结起来，反对右倾保守，全面展开反击。省城“红总站”，正是杨承效领导的支持刘格平、反对张日清的中坚队伍，代表着全省红字号一派共同意志。

从王干部回忆中，我们看到红字号两位大学生头头郭天聪和王俊杰，表现坚强而不俗。这两位长治医专大学生老红卫兵，历经一年多风雨磨炼，正在脱却校园学生气，迅速成长为一派社会群体的指挥员。我联想到：文革早期老红卫兵的成长历程，多是从校园革命到社会血火，再到反思现实，抗击暴政，最后看破红尘……

元月 14 日，红字号长治地区负责人文琪，乘坐海军汽车疾返长治，紧急部署抵抗《八条》。

元月 15 日，红字号驻太原人员侦知联字号将于次日杀回长治，急火攻心。当天聚集 50 余人，在省城并州路汇合后，乘车开赴省革委会，要向谢振华军长强烈反映晋东南危机。其中一条说：联字号长钢武斗队攻打太行锯条厂，把红字号撵到地道里头，联字号准备了大批汽油，要灌入地道里，把红字号往死里烧，请求谢振华立即采取措施。

元月 16 日上午，红字号驻省人员确认，联字号浩大车队已向长治进发。现在，只有依靠全专区武装力量，在晋东南浴血拼杀了。当日中午，红字号驻省人员决定：除陈洪章带领少数人坚持晋京两地上层斗争外，多数人速返长治，参加根据地大决战。

下午 3 时 30 分，红字号在省人员 34 人，同仇敌忾，再次登上了空字 025 的援助飞机。他们要赶在联字号浩大车队前头，返回长治。3 时 35 分，飞机起飞。同机人员中，有海字 0115 部队（海军北海舰队航空兵长治训练基地）许先进政委，他始终被晋东南红字号认做最尊贵的军队首长；4 时 15 分，飞机降落在空字 025 长治基地。

此刻，联字号车队由李英奎带领，正在陆地推进中，现已进入晋东南属辖地界。

一场恶战，即将打响。“一·一六”事件就要爆发。

红字号军事指挥中枢，仍在地区西招待所。前一日，他们强攻医专联字号总部未克。元月16日早晨，指挥部进入迎战“太原来敌”时段。上午，在派兵攻打粮食局，抢救本派头头之后，赵震元总指挥召集淮海厂防区总指挥郝振祥、北郊防区指挥王清海等，紧急部署当晚战斗任务：各部联合出击，要求用伏击战方式，坚决勇猛地扣押俘获全部来犯之敌。——来者有两个解放军武装战斗连队，大小20余辆汽车，上百名重要人物，加上随从人员总计达到400多人，红字号要把他们一口吞下去，可见总指挥赵震元和文琪等人的气魄好生了得，亦可见红字号抵抗到底的信念又是多么坚决。

当日下午，长运红字号据点。郝振祥、王清海召集北部各个作战分队举行战前紧急动员。英雄街以北，驻守长运、市运、市兵团、永红、冷库等武装分队，各指挥悉数参加会议。会议决定，主阵地设在长治市区中心主街道英雄街中段。预计联字号车队将在晚6时以后到达长治，由淮海、红星两支红字号主力军打迎头冲锋，由长运兵力封锁马路以西，由市运兵力封锁马路以东，卡住所有路口巷道，由永红及市兵团人马断后包抄，务必在联字号车队进入伏击地段时勇猛出击，不得使其超过市运、市邮电局，最晚不能放过十字街头。四面合围“包饺子”。专建杨万盛所部和西招待所精锐队伍做预备队，随时实施增援。参战总兵力达到三个营。各路分队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务必统一行动，敢打必胜，预定伏击成功后，将联字号被俘人员解往长运甄别处理。

为避免盲目等待，红字号当日把哨兵哨位远放至北郊一带，密切监视联字号车队入城。

在那血火危急的日子里，红字号、联字号双方参战人员是相当辛苦的。长治市文革史志材料载，双方从上年12月份到次年3月初，几乎无一日不战斗，有“三天一大打，一天一小打”之谓。事实上，常有一日两战甚至一日多战的情况发生。元月16日这天即是如此。头一天红字号联合攻打医专，大炮轰击，出动坦克，激战一日，今天上午，红字号长运头头李连奇、市运头头赵世泉前往西招指挥部开会途中，被联字号一支奇兵突袭抓走。据报退入了地区粮食局小据点内。于是，红字号一面紧急备战晚上伏击，一面派出侯小根等两支队伍，于当日中午12时开始，围打此据点，一者救人，二者此据点本来就在攻击计划之内。打到下午3时，始克。打死联字号2人，俘获守军数十人。同一天，联字号王创全率部攻打红字号西关要塞轴承厂，全天激战而未克。联字号伤亡惨重。当晚，红字号继续参加伏击联字号车队的战斗。昨日大战一天，今日又有三战，你说该有多么辛苦，战火该有何等残酷。

联字号车队在李英奎率领下，一路上侦察前进，走走停停，比预计到达长治的时间晚了两个多小时。

傍晚，车队到达长治以北联字号一座大本营——长治钢铁厂，这里距离市区约30公里。李英奎号令全队停车待命。看样子，今晚要驻扎长钢了，谁都以为

不会贸然入城。

李顺达打开军吉普——指挥车的车门，昂然走下。今天，他身着军装，肩披军大衣，十分威严。李英奎与他合乘同一辆车，此时也下得车来，与长钢指战员一一握手。突然，李英奎下令召集军人紧急会议，研究入城方案。

绝大部分参谋表示，因为没有尖兵，前方情况不明，待车队抵达长治时，天色完全黑下来。夜间进入红字号城区，太危险，应该先驻长钢，把长治守敌情况侦察清楚后，再于次日分批入城。对于入城路线，参谋们也认为绕走城区东郊为宜，因为军分区驻东关教导队可以武装策应，地势开阔平坦，不易遭到伏击。而西面和正北两个口子，街道逼仄，必有红字号重兵把守，李顺达等非战斗人员一大批，老的老，小的小，不能挺身作战，一旦钻入主街筒子，前头一打一停，后头奔逃无路，极易发生不测，酿成大祸。

参谋们所言，均在常识范围，是有道理的。避宽而就窄，避安而就险，避虚而就实，易遭伏击，乃古今行军大忌。

此刻的李英奎首长，威严冷峻而沉默不语。他身经百战，屡立战功，头脑清醒，情况熟悉，哪里会发生失误呢？他自参加广西革命始，打过日本人，打过蒋介石，打过阎锡山，打过李承晚，打过美国佬，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1949年在徐向前指挥下，李英奎所在66军攻打华北最顽固堡垒太原府。总攻是日，李英奎率一支尖刀连队，拼死突进，一直打进了阎锡山都督府，占领了最中心的梅山会议厅；他两度开赴抗美援朝前线，屡建奇功，据说“奇袭白虎团”的故事，就发生在李所指挥的部队；文革前，李曾任66军某师副师长，驻守天津。

据说，眼下69军副军长肖选进将军，曾经做过他的上级。想不到，在山西文革战场上，李英奎又归辖到了肖将军麾下，共同解决太行山红字号顽敌，真让人豪情四溢，感慨万分。

天已大黑。人们纷纷下车，准备长钢过夜。后勤人员抓紧号房，从容安排宿营。老劳模李顺达已经进了房间，脱下大衣，准备休息。

突然，传来李英奎首长命令：全体上车，立即进城！

人们惊异了：这可能吗？一位跟随李顺达的干部亦有军事经验，他表示怀疑：是不是命令传错了？一问，命令没有错。他又直接向李英奎首长咨询，说现在进城不安全嘛，当即遭到李的训斥：你们懂什么，执行命令！

李英奎首长当晚是怎样思考决策的，今天的我们不好盲目揣测。但有史料载，进城前，李曾命同行的69军郭处长，接通了驻长治海字0115部队的电话，说要进城。海军即派一名军官马副团长，迅速前往长治北郊迎候。在飞机场一带，马副团长迎头见到李英奎，说明当晚进城甚不安全，尤其不宜选择正北主街道路线，并建议车队当晚驻扎北郊海军大院，明日实施进城。而李英奎却未采纳马副团长意见，而是反复提问：市内英雄街长运是否会打？手管局大楼是否会打？马副团长倾向红字号观点，当然不愿指证红字号会打伏击，或者他根本无从判断红字号会不会打，即使他判断红字号会打伏击而口头上也不会向李英奎承认，再说，红字号会不会打，陆军首长干嘛要问我们海军？我们海军指挥他们打不打吗？

在这样一个接头之后，已是当晚8时许。李英奎命令全队，即刻驱车进城。他恰恰选择了从长治市主街道开进的路线。

或许，李英奎是要采用出其不意战法，从军事威慑上、从心理上，首先战胜对手？或许，李英奎是要诱使红字号“疯狂出击”，犯下空前大错，以利于联字号大反攻师出有名？这只是我们对于历史事件的某种分析与猜测。

还有一个细节：此次南进长治，一路上李英奎和李顺达同乘一辆指挥车，二人从半年前红字号围堵军分区以来，历经北京“七月会议”，10月刘格平来长，12月北京再次开会，今年元月省城决斗，结下了深厚友情。现在，紧要关头，两位老李却分开来，分别乘坐两部车辆进城。李英奎仍乘指挥车，与前头战斗连队紧紧相随，李顺达则被安排到另外一辆车上，夹在车队中间。是谁让老李此刻换车的？

车队开着大灯，在一片烟雾中鱼贯前行。长治红字号远放哨兵首先发现敌情，继而长运据点哨所发现车队驶入英雄街北口。红字号伏兵全部按照战前布署，严阵以待，刀出鞘，弹上膛，手榴弹开盖。

赵震元等人据守西招指挥所，用电话掌控全局，等待战斗打响。

还是这条英雄街。1950年代之初，李顺达从北京载誉归来，人欢马叫，歌舞升平。十几年过去，如今李顺达又回到了这条街上，你沿街观看，百姓奔逃全无，一切商务断绝，人间烟火不再，断壁残垣，朔风怒号；街头处处是工事，麻袋里装满了漳河的黄沙。曾经无比繁华的马路上，弹坑累累，残车占道。街垒里巷口处，冷枪时发，黑灯瞎火，除了枪手们如幽灵般时而闪过，再无半些人气。活活一座阴间地府的废都。毫不夸张地说，这里连一条人世间的狗都见不到，野狗们家狗们，被射杀吃肉，差不多打光了。狗们想活命，必须跑到野外去变做狼。

此街中段，就是即将发生战斗的阵地。一辆百孔千疮的破烂汽车横卧于马路当中，占据了马路宽度的三分之二。

伏兵们躲在暗处，一颗颗手榴弹的丝质白色拉弦，前头一个小环，扣在了红字号战士小拇指上，四周静得出奇。突然，红字号高音喇叭启动，严厉警告联字号车队停止前进，退出戒严区域，否则一切后果由来犯者负责……

车队已经深入街区，掉头回去是不可能的。开路军车上，战士们不断用步话机向指挥车李副司令员报告前方情况。当车队行至市运及手管局大楼时，李英奎命令部队战士全体高唱语录歌，高呼“毛主席万岁”，高呼文革口号，奋勇前进！

雪亮的军车大灯照亮了前头横置的破汽车，开道战士立即报告受阻路况，李英奎命令：开足马力，从破汽车一侧强行通过。

话音刚落，前头有炸药包引爆，炸声震耳，火光冲天，令人灵魂出窍。这正是伏击战斗的信号，顿时，英雄街头枪声大作，弹飞如雨，杀声震夜，数不清的手榴弹在车队近旁连续爆炸。红字号五百余名战斗队员勇猛出击，高呼“放下武器，缴枪不杀”！整条马路已被密集火力封锁，此刻，开道战士的耳机里只有李英奎的喝令：冲过去，坚决冲过去！不许停车，跟我来！跟我来！

说时迟，那时快，李英奎的指挥车冒着极大危险，率先超越了开道军车，在枪林弹雨中冲到了最前头，他不停地呼叫：跟我来，跟我冲过去！

指挥车带着疾风，接近了阻路破车，侧旁，刚好有少许宽度，指挥车瞅准这个空档，加大油门飞驶掠过，地面上的累累弹坑使它连续跳跃着，疯狂地冲向远方。

紧随其后，又一辆小车猛窜而过。

在前后左右的枪弹声中，69军开道连队四辆军车，把一侧轮子跨在人行道上，怒吼着冲了过去。单等武装军车过毕，红字号战斗队员突然猛力推出一辆拖挂车来，实实堵塞了全部路面。

非军人的卡车冲到口子处，在一片爆炸声中垮了下来，车轮停止了转动。

李英奎的指挥车和开道的69军连队，共计四大两小六辆军车，冲出了伏击圈，脱离了险境。余下9辆卡车、大客车——最重要的有李顺达所乘吉普车，还有核心小组首脑们，陷入重重包围之中。压阵断后的省军区护送连队所乘军车，被截成三段。战士们因没有得到开枪命令而未敢还击作战，悉数被红字号缴械。

“举起手来！缴枪不杀！”红字号的斥喊声震耳欲聋。

李顺达木然坐在车里，没了话语。他望着前头道路上那熊熊烈火，似乎要望穿火焰，追寻李英奎奔突后的车影。

此时，红字号副总指挥杨万盛带领预备队，大举增援而来，进一步加强战地指挥力量。杨一到来，即命被缴械的省军区连队官兵一律不得下车，全体听候处理。并说可以保证军人们的安全。

杨万盛等头头动员参战人员，把刚刚缴获的省军区连队枪支收到一起，交还其带队军官，命该连队次日务必离开长治，退返太原。当夜由海字0115部队来人，把这支陆军连队领至海军大院休息不提。

英雄街头，硝烟弥漫中，整个联字号车队被团团围住。任由红字号将士逐批往外押解俘虏。被俘人员一串一串地押解到附近长运大据点，进行突击审讯，甄别处理。

李顺达等联字号新政重要人物，包括军分区4546独立团和长治武装部首长，一律被俘。李所乘坐的吉普车在车队中格外显眼。

车门被猛地打开，李顺达坐着没动。枪口之下一声断喝：“这是谁！”

警卫战士回答：“这是我们军长。”

几支强烈的手电光立即打过去，光点刺射着李顺达的眼睛，使太行老农脸上特有的皱纹一览无余。那皱纹饱经风霜，深刻无比。

李顺达还是坐着没动。红字号头头冷笑：“好啊，老农贼甚时候升了军长啦？”

有人高喊：“把枪交出来！”

头头厉声命令：“把李顺达这个老贼拖出去！”

可怜李顺达被人拳脚相加扔在车下，就扔在这条始终被叫做“英雄街”的冰冷马路上。革命境遇今非昔比，革命人生反差太大。

“扑哧”，一颗手榴弹像铁锤一般砸在了李顺达头上，血立即冒了出来，血

顺着脖子流淌而下，浸湿了他的内衣：“砸的就是你这个冒牌军长！”

李顺达和一百多名俘虏一起，高举双手被押至长运。不幸中有万幸，红字号一位长运医务职工，少年时在课本上读过《李顺达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便上前招呼，态度温和地为老李医治头部伤口，止了血，包扎了绷带，甚至还给他弄了一口水喝。优待举动，差点把老李感动得落下泪来，以致于他在后来狠批程首创的讲话中，念念不忘地提到了这件事，说“红字号里头也有好人”。

李顺达刚刚喘了口气，即有一群武装人员闯进房来，枪口威凛，钢铐冰森，为首头头指令：“把这个老农贼拉出去，枪毙他！”

李顺达没有力气反抗，枪毙啊！他哀嚎长叹，他为自己光辉的一生竟是这般完结而叹息。

重新蒙上眼，重新塞住嘴，重新拖上汽车。

半小时后，汽车停下来。我们不知道老李在此黑暗路途的颠簸中想了些什么，他又是如何看待死亡的。

一场假枪毙，实际是转移，杀杀老李的威风罢。

李顺达被押到一座楼上。有人开始对他仔细搜查。

一本快要用烂的大字本《毛主席语录》，十来块钱，十来斤粮票。

军衣脱下来，血淋淋的内衣脱下来，鞋、袜子、裤子一律脱掉检查。

问：“八条黑文件藏到哪里啦？”

答：“我能识几个字？咱不带文件。”

问：“枪哩？把枪藏哪儿啦？”

答：“咱还敢带枪！咱连个铅笔刀都没有。”

问：“你知道这是甚地方？”

答：“说不好，该不是淮海厂吧？”

问：“你怎么知道这儿是淮海？”

答：“是五几年来，师傅们请我作过工农联盟报告。”

问：“记得可清哩，还作屁报告哩，还联盟哩？”

答：“到这儿我可就放心啦。”

问：“因为甚放心？”

答：“你们是工人，咱是农民，工农一家，都不是走资派，打破了头，打不破心！”

问：“说得比唱得还好听哩，咱们现在可不是一条心啊，联字号和你一条心嘛！”

答：“工人好，工人不会瞎胡搞。”

那头头最后说：“行啦行啦，半个烧饼吃不饱，还是把你捆扁起来吧！”

李顺达被押到那个幽暗的地下室，走廊紧里头还有一个黑屋。几个同时被俘的地区核心小组成员也被关入这一区域。他们都是老干部，本来要接替程首创作新官，转眼间成了红字号的囚犯。据李顺达在1970年一份回忆说，他被捆在这里两天三夜，受够了下马威，以后一连被关押了26个日日夜夜。



这是一个惊险的夜晚。被俘人员全部经历了审讯过程。赵震元有令：大肥猪留下，小兔子放走！三天以后，从长运据点放走一批老弱病残闲散家属或无关紧要的人。当夜捕人太多，红字号突审匆忙不过细，“管球不了这么多人吃饭！”疏忽之中，使一些陷入险境的要人幸免于难。这中间，竟然有红字号最大敌人武天明司令员的夫人张如月女士，还带着两个小儿子。我们殊难预料，她一旦被辨认出来，处在极端对立派的狂躁激愤中，会是怎样一个悲惨后果。2004年夏，我从长治驱车东下太行，到石家庄，去寻访武天明夫妇，一提此事，张如月老太太依旧惊魂未定。她用浓厚的山西口音对我回忆：

“真不敢提那个‘一·一六’事件。那黑夜在街上，又爆炸又扫射，差点儿吃了枪子儿，然后把我们押送到一个地方，应该是长运学校吧，把我们几个分区家属和娃儿们关在一起。还有民兵抗日老英雄黄小旦，他哪像个公社武装部长，倒像个农村老汉，当时红字号没有认出来。女同志里头，还有崔副政委家里的（崔修德夫人）。我们从太原搭顺车回长治，说是形势要好转哩，没想到遇下这么大危险。我还带着俩娃娃呢！真担心坏蛋欺负娃娃们。”我注意到，张如月老人的头发尚未全白。

老太太说到这里，年迈的武天明司令员插进话来，竟无意中证实了一个疑点，他说：“唉，那个‘一·一六’啊，出发之前，在太原定过方案嘛，我们研究了一下，行军当天要驻扎长钢或者长北，然后分批进入市区，这样可以避开伏击，减少损失嘛。当时我留在太原，李英奎带队出发了。谁知道到了长治，李英奎他就决定这么干！下命令冒险进城了嘛……”

李英奎在文革中，他经常独断做出决策，并不一定事事与游击战出身的武天明商议，这是常事。武天明司令员的插话，可信性应是较大的。但是，李英奎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呢？至今令人费解。

张如月老太太年轻时也参加过抗日工作，语言表达很清楚。她继续回忆：“我们十多个人关在一起，抓紧商议了一下，说千万不敢暴露身份啊，刚说完，红字号一伙人踢门就进来了，一进门，那个头头二话不说，举枪朝着房梁上叭叭叭就是三枪！打得灰土落下来，谁也不敢吭气。这才一个个登记，我当然用了假名字，黄小旦也用了假名字。审问我时候，问我是干啥的，我说我是分区搞后勤的王管理员家属，红字号为了证明这一点，还问了别人，别人都保护咱们，哪敢提武天明三个字，只说确实是王管理员的家属。人家不信，把我家文进、奋斗两个小孩儿叫过来，又问，说你爸妈平日在分区机关干甚哩？那年文进刚十岁吧，奋斗才六岁，他俩说的好，说是谁家房子破了就给谁家修呗，这下人家才相信了。熬到第三天晚上，门锁一开，总算把我们娘仨放了！一放出来，害怕人家后悔追上来，赶紧想办法躲，街上人也没有，灯也没有，红字号全城戒严嘛，我们不敢往分区走，我想起一个部队家属，就住在不远处，我们赶紧往她家跑，是人家把我们藏了一夜，后来才让分区的人悄悄把我们接走。实在很可怕。果然，第二天，红字号发现放我放错了，知道咱是武天明家属啦！就去审问拷打包庇过我们的人！唉，

总算躲过一场大祸，差一点儿就活不成了。”

武天明司令员长长地叹了口气，凝神看一阵老伴，没有言语。他扶稳了沙发把手，艰难地站起身来，努力移动曾经负伤的老腿，疲倦地说：“我躺躺去，要躺一下，想起那些事，说都说不动啦！”

不难看出，他对长治文革岁月充满哀伤。一年后，到2005年底，我写到“一·一六”一段往事，忽听人讲，武天明司令员已经病卧在床，不能起身了。他晚年一心想回住山西，可叹这愿望恐怕很难实现了。

### 事件后果特别严重

“一·一六”事件的爆发，在红字号、联字号各个占领区，乃至太原、北京，引发强烈震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真理。红字号对此欢欣鼓舞，海军首长和身在石家庄海军农场的程首创，都认为“这一仗打得好”，“赵震元在长治打了一场漂亮仗，看他们怎么办”，“这是用实际行动，对刘格平的最大支持”！红字号认为，联字号对待“七月会议”也是顽强抵抗，现在我们如法炮制，无可争议；少数人如陈洪章等，则认为全国形势大变，此一时彼一时也，全盘扣押新的核心小组成员，特别是扣押李顺达，是鲁莽的军事行动，正上了李英奎等人的大当，军队支左干部必将以此为借口，胁迫中央派兵大举围剿红字号，局势将更加严峻。当时，陈洪章等头头仍滞留北京、太原，闻知事件爆发，疾呼大事不好，曾从太原电话打来，对长治将领连跺脚带骂：“简直是蛮干嘛！人家正想让咱这么干哩，他们正想让咱们公开对抗中央会议，正想让咱们反军杀人哩，抓住个李顺达有什么用？”

长治回电：“是不是放了他？”

太原：“现在放了也白搭，既然事件已经发生，我们只能尽力争取他，争取李顺达对我们的支持和理解，带动其他人反戈一击！”

长治：“不好争取啊，咱们的人动手打了他……”

太原：“真混啊，要赶快松绑，赶快解释，赶快慰问！……告诉同志们，我们可能会陷入最坏境地，要做应付最坏局面的打算。谢振华他们一定会充分利用此事，调动军队围剿晋东南，仗会越打越艰苦，要做最后的准备。”

联字号方面，受到震动更为强烈，也有人抱怨过李英奎胆大妄为，独断专行，造成了损失，但是，他们很快统一了思想，全力以赴对付红字号。俗话说，舍不得孩子打不住狼，为了最后胜利，这点损失算得了什么？现在狼已落入陷阱，要抓紧围歼。

事发当晚，军分区火速派出一辆吉普车，载精干军官，急如星火奔赴太原，报告长治事变。这位军官在次日早晨到达太原后，立即找到联字号驻并高级联络员苗福俊，要求他紧急带路，面见武天明司令员。旋即武天明在省军区接见来者，听取汇报。据当事人讲，这位军官一见武天明，泪如泉涌，连称大事不好，语不成句，并首先汇报武天明夫人和孩子身处险境，顿时遭到司令员厉声喝斥：“站好！你慌什么？你哪里像个军人？说什么家属的事？先汇报李顺达他们的情况，

先汇报李英奎副司令员的情况！”

那军官受到鞭策，登时清醒，始将遭到伏击的惨痛情况，一一禀报：被红字号俘获的重要人物有——省核心小组新确定的晋东南核心小组多数成员，如李顺达、贾茂亭、常三毛、李世源等多位老干部，军队干部有：军分区参谋长金鹏、直属 4546 独立团团长岳忠泰，长治市武装部政委赵成旺，部分县市和大企业领导人，多位公社武装部长，包括民兵英雄黄小旦，全区民兵学毛著积极分子荣改改，首都红代会成员、清华大学井冈山邢晓光等。如此老中青、工农兵一百多号人，其份量已是极重。地市联字号重要骨干几被一网打尽，或曰打掉大半。眼下，这批人处在生命危急中。

武天明当即命令：就地写出书面紧急报告，写上：呈省军区，呈谢振华，呈北京军区郑维山，呈中央军委，呈中央文革，呈康生，呈林彪副主席，呈周总理，呈毛泽东主席。

谢振华、张日清、刘格平等省府首脑面对这一严重事件，无不受到震动，北京方面，凡刚刚参与解决山西问题“十二月会议”的中央军政要员，均接到通报，称“晋东南发生了严重事件”，北京会议又白开了！他们干扰破坏了毛泽东急于制止动乱、召开“九大”的战略部署，这无疑是“程首创等一批坏人操纵破坏的结果”，山西晋东南问题，终于到了以非常手段解决的时候。

局势迅速向极不利于红字号的方向发展。

李英奎副司令员精神抖擞，发扬我军连续战斗、不怕疲劳、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优良传统，昼夜奔驰在长治、太原、北京之间，全力推动北京军区，推动中央，做出大规模出兵晋东南的决策。

雪片一样的《晋东南告急》电报，飞向北京城，飞向中南海。据王法书先生回忆：事件发生后，全区联字号紧急行动起来，利用各种通讯手段，以各种名义，从最基层向北京全面告急。长治邮电系统瘫痪在红字号手中，联字号就充分利用掌控中的数县邮电局，拍发告急电报。不能发报的县市，则借助河北、河南边境或铁路、兵工渠道，向中央发报，请求中央迅速派遣大军出征太行，采取果断措施，严惩红字号“一小撮”坏人。王法书先生至今感慨：这些“十万火急”的电传到北京，少说也有两千件吧！同时在北京党政军三方面造成极大声势。

文革中有一个名词，叫“开枪权”，专指军队出面解决地方战事的合法性。现在，晋东南军分区和联字号，包括以谢振华为首的 69 军等山西支左部队，要的就是这项权利。所谓开枪之权，不见得要一个明确授权的“开枪”命令，而是要看大军区是否加派作战军队前往，要看战士手中发不发子弹，要看指挥者掌握命令的尺度。例如周恩来曾在某次会议上公开讲到：文革中军队指战员的艰苦程度“超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因为“战时还有休整，现在只有坚持嘛”，周恩来在讲这段话时，表扬了军队的克制，说“发给战士 30 发子弹，交回了 27 发嘛！”即指开枪也是常有现象。

文革中大部队进军晋东南，荡平红字号集团，已是不争史实，但史料记载很

不完整。人们在搜集整理军队动向方面困难重重，受到相当限制，要报告 1968 年元月至二月中央军委及北京军区针对晋东南的军事调度详情，史海探秘，是颇困难的。长期以来，我留意查寻，日积月累，逐渐有所收获……

这里要说的是，长治地区红字号，武装绑架了李顺达等大批晋东南核心小组成员，俘获了军分区参谋长和直属陆军团长以及市武装部政委，“缴获了部队武器、装备和电台物资”，全区大规模武斗再度升级，促使当局派出军队前往平息动乱，从此改变了“人民内部”派性大战的性质，导致了更加惨烈的文革悲剧发生。

说事件是军分区指挥员诱发的，或者说是红字号盲动，均非认识历史的关键所在。一切偶然性的诱发和当事人的盲动，都不过是一个环节罢了。历史事件发生有其必然性，文革战争发展到了水火难容不可收拾的地步，长期的残酷对立早已使人变成了战争机器一部分，厮杀不会突然中止。大悲剧的总导演不是他们，大流血的责任更不是他们。

### 陈永贵不睬蒯大富

“一·一六”事件发生，北京党政军要员反应强烈。出人意料的是，文革五大首都红卫兵领袖之一、清华大学井冈山蒯大富司令，也反应强烈。这是因为长治红字号同时抓捕了清华代表邢晓光。蒯大富知悉情况危急，为营救战友邢晓光，连续给山西刘格平、陈永贵、谢振华等人发电报打电话，要求立即设法营救清华战友，保护邢晓光的生命安全。山西文革之初，北京红卫兵朱永庚、赵景春、邢晓光等，都是赴晋“煽风点火”的风云人物，是“响当当的造反派”骄子，在山西各界曾产生较大影响。如今邢晓光落难，蒯大富营救，似有相当力度。问题在于，大名鼎鼎的蒯大富发出呼救之声，山西诸位首脑的回应态度，却耐人寻味。

首先看军人们，正在为进军太行调兵遣将积极备战，选用的口号是“营救李顺达和革命委员会成员”，而对同时被俘的北京红卫兵小将邢晓光，却只字不提。也许，这是因为，北京学生造反派在太行山民众中不但没有号召力，反而在大部分人印象中是“闹事者”。毛泽东说“现在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中央文革也说，北京不允许学生管工人，红卫兵行将退出而工人即将登台。学生造反派的地位直线下落，或者说本来也没有真正确立社会地位，是被充分利用过的牺牲品而已。学生造反派失宠，说不定还要卸磨杀驴。大敌当前，秣马厉兵，谢振华和军人们无需借学生什么光。

刘格平同样不客气，此前，山西刘派曾把邢晓光等人打成了反革命，现在邢又要闹平反，投奔晋东南联字号，反刘格平，刘派早把他当成了对立面，哪里还会救他。

陈永贵如何？他对此事更是冷嘲热嘲。

1968 年 2 月 6 日下午，太原某组织与老陈座谈，其中谈到蒯大富为邢晓光求救一事，老陈的话语十分有趣。他们是这样谈的——

问：据说邢晓光在晋东南被抓了？

陈：活该！谁要他不在北京复课闹革命，跑到山西来闹？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山西人民不会搞？邢晓光这个人很坏，上回在北京，指着鼻子骂刘格平同志，真不像话。

问：邢晓光等人宣称，要在山西闹平反。

陈：他闹什么平反！中央都不允许北京学生进工厂，他倒能来山西闹，还平什么反？他想干什么？中央要求我们要有敌情观念嘛。

问：都说蒯大富给山西党政通电来信，要求释放和保护邢晓光。

陈：我不看这种信。什么蒯大富？甚富也不行！（众笑）

问：都知道邢晓光与张日清有联系。

陈：那还用说？这些人让农村交不上公粮，让工厂交不出产品，山西现在没有煤，没有布，他们干了坏事又把坏事推到刘格平身上，要给刘格平政委好看！

问：您看过我们 75 家组织联合发表支持刘格平的声明吗？

陈：看过啦，知道啦，这才像个革命派。

问：我们担心，山西这样乱下去，再搞一年恐怕还不行。

陈：一年？三年也不行！你们小鬼也不放心啦？要相信毛主席，天不会塌下来，让他们闹吧！

陈永贵讲话，具有北方农民语言中特别的一种幽默感，正话反话连着说，运用娴熟。多么重大话题，到了农人政治家嘴里，也会变得轻松自如，把国事说的跟自己家事儿似的。有时候，国家和咱家，干脆就混成一体了，渗透出许多古远不变的深沉道理。

周恩来和康生等人，在 1968 年夏季以前，曾经多次表扬“陈永贵同志最没有派性”，其实老陈哪能没有派性呢？文革漩涡中人谁没有派性呢？而周、康等人当初表扬老陈又是发自内心的，他们不像也不必盲目吹捧老陈。这里头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老陈自身讲话的艺术性。

当然，最后老陈还是暴露了他的红字号派性立场。周恩来在 1969 年 2 月公开批评老陈：“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陈永贵陷入了派性，被一派利用，对一派讲得多，听得少，亲一派，疏一派。”

再说邢晓光。有军分区在“一·一六”事件后上报省军区的专题报告称：“晋东南红字号对抓获的邢晓光等同学施以毒刑，惨无人道”云云。报告反映了某种真实，距实际情况八九不离十，邢晓光确被晋东南红字号毒打多次，吃尽了太行山人的苦头，邢晓光在当时留下一条命，已是万幸了。

提起军分区这份专题报告，我们不妨再引用一段文字，看看军人们对红字号这场伏击战怎样评价，以结束本章：

“谁走漏了情报？部队护送晋东南人员回长治，出发前并未公开通知，行动是很迅速的。但红字号的伏击完全准备好了。选择的攻击地点非常有利，部署非常巧妙。首先开枪投弹造成声势，有意放过了 69 军开道武装连队，然后用拖车迅速封堵口子，以强大火力，展开猛烈袭击，很快就冲上来大批战斗人员，并把位于车队后部的独立师连队冲成三段，全部缴械。然后，在重重包围中放手抓捕

被护送的非武装人员。其作战行动的准确、迅速表明，战前准备充分，战斗指挥有方，决非一般武斗可比。”由此可见，职业军人们对这次伏击战评价甚高，和评价半年前冷兵器时期的高平陈区之战一样高。

是啊，从军事上说，红字号又一次打了大胜仗。他们干净利落，成功俘获联字号军政要员 105 人，自己几无伤亡。而战前准备的时间并不充分，头一天还在专心攻打医专，事件当日还出击地区粮食局，俘获联字号数十人，同时保卫西关要塞轴承厂而与王创全的进攻队伍大战整整一个白天，夜间即打胜了如此大规模的伏击战，斩获甚丰。红字号赵震元这帮当年的“老八路”真能打仗，真能吃苦，真不简单啊！

然而胜利的喜悦竟是那样短暂。过不了几天，红字号民众最悲壮最凄惨的时刻就会到来。

读者们分明已经听到，从四面八方，传来了各路野战大军挺进上党的隆隆轰鸣声。

太行号文革列车，终于驶向了最黑暗的深长隧道。一场派战大流血，就要进入高潮。

---

【蓦然回首】

## 在动乱年月当县委书记

李 辅

按：本篇节选自作者的长篇回忆录《所思所忆七十年》，标题是另拟的。本刊发表时略有修订。

一九六九年中央学习班结束后我回到太原，一九七〇年被安排到阳曲县辛庄插队（任大队支部书记）。有一次到县里开会，晚上我去看望刚“站出来”不久到阳曲县当了革委会主任的原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王谦。在聊天时，他很赞赏我当大队支部书记，说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当一下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对一个领导干部的成长十分重要。当时我心想，一个基层支部书记，怎敢想当县委书记，那不是有政治野心了吗？

一九七三年我已在省委调研室当了二年多副主任，在下乡调查过程中学习了好多好县委书记的成功经验。那时省城形势又开始动荡，闹派性的一些人又想搞乱形势。我十分厌恶派性，真想在年轻时干点有意义的事情。那会儿，省里正筹备新的团省委，省委想安排我当团省委副书记。我不想在省城机关工作了，又想起王谦“当县委书记”的建议，就找省委二把手曹中南，提出了我的想法和要求，省委支持我，满足了我的愿望。

### 上任襄汾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初，我带领工作队到了襄汾。在离开太原时，省委第一书记

记谢振华告诉我，襄汾的书记（县武装部政委刘天佑）有病，让其回武装部。你先搞第一副书记，后接任书记。所以一到襄汾，我就主持了县委工作。县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王光裕对此不满——地委原来答应王光裕接任县委书记，省委的决定出乎他的意料，马上就称病不上班了。县委副书记还有王文学、李红星，常委有吴克敏、杨学文，是一个残缺不全的班子。省委派调研室的老同志、我在党校时的老师陈良柱到襄汾帮助我工作。他留在县上，没有下乡。另外工作队的两个参加常委的曲润海和康宇，都到了大队蹲点。

工作开始，主要是根据中央和省委的部署，抓全县的基本路线教育，学习大寨，批判资本主义，解决“五种人”（走资派、民主革命派、老好人、混进班子里的坏人和阶级异己分子）掌权的问题（这是由陈永贵在昔阳最先“发明”搞起来的）。最初，工作队抓宣传发动群众，调查了解问题。我初来乍到，把精力也放在调查研究上。

襄汾县是一九五三年由襄陵县和汾城县（古称太平县）合并而成的，合并后就把县城建在史村车站这块地方。晋南流传民谣称：金襄陵、银太平，数了曲沃、数翼城。金襄陵，水利条件好，人口密度大，人均地少，盛产小麦、玉米，老百姓合作化前还吃玉米窝头。金，是由黄色的玉米得名。银太平，土地广阔，人口较少，盛产小麦，老百姓过去日常吃的都是白面馍。回茬种玉米是作为牲畜的饲料。统购统销以后，有些群众大缸装满玉米，叫喊没粮吃，不把玉米当作人的食粮。百姓只吃白面，吃出一个银太平。襄汾县矿产资源也十分丰富，金、银、铜、铁、锡，除去没有锡矿，其它四金样样都有。当时，全县九十多万亩土地，三十多万人口，人均三亩土地，生产条件在全省也名列前茅。工业方面有纺织厂、造纸厂、化肥厂、轧钢厂、农机厂，五小工业一应俱全。襄汾民风淳朴，百姓善良厚道，算得上旧时所称的“顺民”。

### 总得让老百姓活下去

文化大革命中“农业学大寨”对这里的破坏十分严重。

文化大革命“一月风暴”后，襄汾县分为“三一八”和“一·二六”两派。“一·二六”人数很少，不成气候。“三一八”以周文虎、王林等为头头，率众攻打临汾参加过大型武斗。襄汾还成为“三一八”派武斗的后方基地。

《七二三布告》平息武斗后，支左解放军掌握领导权，刘天佑政委担任了县委书记。刘政委不懂农业，积极开展学大寨，舍弃生产小麦，大面积推广高粱，群众对种高粱没有积极性，加上天旱，连年减产，一个产粮大县，竟然还得吃返销粮。许多社员缺粮吃，甚至连高粱也吃不上，不得不全家上阵，拉上小平车到乡宁拉煤，在城里卖了煤，换上一、二斗红高粱。

我去襄汾不久，地委书记赵雨亭领导学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派分管农业的副书记董启民、任清海在汾城公社汾阳坡填沟造地，搞人造小平原。并组织全区到汾城公社参观。赵雨亭路经襄汾城边，看到许多卖炭的小平车，乘车去汾城的路上，也看到接二连三拉煤的小平车。凭此就说襄汾“重副轻农”“弃农经商”，

资本主义十分严重，让狠批资本主义，组织大批劳力，搞农田基本建设，起高垫低，建设人造小平原。

我去汾城农田基本建设现场参观，看到挖地四、五尺，垫到沟里，全部是生土，造上二三分地，得几十个、上百个工，垫出来的地根本不能耕种：因为熟土耕作层全部破坏了，垫出来的地表墒失散，毛细吸管破坏，地下水分吸不上来，又没有井水浇灌，不要说一年不能种，二、三年内也不会长庄稼。完全是为了参观的“花架子工程”。我从内心不满，认为地委完全是搞形式主义，搞这种农田基本建设是劳民伤财。

再看群众拉煤。他们真的是搞资本主义吗？我在卖煤的街边向群众了解真实情况，又沿着去古城公社到乡宁台头的路上，向拉煤的群众寻访。那时你常常看到一辆平车拉上千斤煤，一个大男人架辕，前边有一头小毛驴拉套，没有小毛驴，就是一个帮拉的女人或小孩。有的女人或小孩跟在后边跑，上坡时推车，下坡时倒拉以便减速刹车。他们一个个蓬头垢面，满身煤灰，跑几十里路，受的是牛马苦。我再深入到峪口，看那弯曲的山路，一道道“瞪眼坡”，拉上一辆空车，两三个人也得费上吃奶的劲，才能爬上去。下坡时，向下的推力和惯性，催得人紧跑，车后的人紧拉硬拽也难放慢速度。这受的是什么苦！他们没有别的生路，有半点办法，也不会妻儿老小齐上阵去干那样的重活、脏活、险活。你一个个去问，都是为了换斗红高粱。难道批资本主义就要断他们的生路吗？

经过调查，我在全县干部大会上讲，社员们上山拉煤是为了换斗红高粱吃，不是搞资本主义，不能批。我们总得让老百姓活下去啊！我这样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赢得了民心。后来在襄汾都传说我上山拉煤，体察民情，给我编了一个故事。

从到襄汾工作开始，我就这样与地委书记赵雨亭发生了分歧。到底是为民，还是迎合上级为自己当官，这是两条不同的思想路线。我自己当过农民，受过苦，知道农民的艰难。绝不能当了官就忘了本，为自己升官，欺负老百姓！

### 把干部宋澜请回来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四日，省委正式发文免去刘天佑县委书记职务，任命我为襄汾县委书记。县委班子残缺不全，副书记、革委主任王光裕躺倒不干了，政工组长杨金田回到武装部工作了，要开展工作，总得先把班子配齐。

周围的干部极力推荐宋澜回县里工作。宋澜在文革前曾担任县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农业。这是一名抗日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作风踏实，生活俭朴，有工农干部的本质和特点。从穿着打扮看不出是一个领导干部。到了老百姓家里吃派饭，两个馍一根大葱就算了事。襄汾县群众中传颂着他好多俭朴、务实的故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老百姓口口相传的他在一九五八年领导建设汾城万亩苹果园的事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别的地方“放卫星”，比吹牛，搞劳民伤财的工程。宋澜根据襄汾自然条件的特点，在汾城公社良陌大队、南膏腴大队、北膏腴大队几个村连片规划了一个万亩果园。他亲自规划，亲自组织群众挖坑栽树。宋澜要求严格，栽树时必须横平竖直，对角也要成为一条线。有人说，还让人在



姑射山上用望远镜观察果树栽得是否整齐。万亩果园从规模之大，栽种的规范、整齐，确实是一颗“卫星”，晋南全区独一无二。文化大革命支左解放军掌权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凭借权力把万亩果园绝大部分平调过去，建起了总政、总后的农场。总政后来就在果园办起了总政五七干校。未被平调走果园的良陌村，依靠苹果的收入，是全县最富的村庄。

每当人们议论良陌的富裕，就必然想到宋澜在建设万亩果园上的功劳，称赞他实事求是，工作踏实的优秀品质。但是，文革中，宋澜被打成“走资派”。后被调离襄汾。先去侯马市当了革委副主任，因和“支左”人员合不来，被迫休息。又被安排到汾西灌区挂了个副主任，也没有去上班，赋闲在家里。全县许多干部呼唤他回来。但是嫉妒宋澜的掌权人，就是排斥宋澜，坚决不让他回来。

宋澜是老干部的优秀代表，而且他熟悉襄汾的自然条件、生产特点，请他回来既得民心，又可以发挥他的优势，为襄汾作出贡献。我向地委作了请调宋澜的汇报。赵雨亭开始不同意，认为宋澜“保守”，工作消极，长期不上班表现不好。后经我再三请求，才调回襄汾任命为常委、革委副主任。没有按照我的要求，让宋担任县委副书记。赵雨亭对宋早有偏见，宋澜脾气耿直，不会吹牛拍马搞浮夸，恐怕这是历史形成的过节。

后来，又把有工作实力、勤勤恳恳，多数干部支持的史崇实任命为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把熟悉农业，人缘较好的杨保富安排为县革委副主任。这样，一个工作班子组织起来了，可以运转应付局面了。

### 新官头把火半途而熄

一九七四年初，周恩来、江青等中央领导人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讲话时，迟群和谢静宜在讲话中提出了大反“走后门”的问题，说是现在有一股“走后门”的歪风，“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提，可以可以”。对于“走后门”的歪风，群众早就恨之入骨。特别是对招工，普遍有意见。反“走后门”，深得民心。襄汾工作怎么开展，本来还没想好，结果一传达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群情激愤，一触即发，成了我新官上任“三把火”的第一把火。群众的大字报直轰计委主任李胜枝和分管招工的计委干部裴某，具体揭发裴通过后门就安排了六十多人。

揭发“走后门”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动员“走后门”进来的人，主动回农村劳动。结果，卫生局副局长的姑娘吉红霞和城关镇公社主任张怀石的姑娘，成为响应中央号召的带头人。我也大加宣传，鼓励其与歪风邪气斗争的决心和勇气，支持其回村闹革命。运动如火如荼，越烧越旺。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日，中央又下发了八号文件，传达有毛主席的话，文件说：“这个问题牵涉到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需要具体分析，慎重对待。当前，批林批孔刚刚展开，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因此，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应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毛主席不主张反“走后门”了。

一瓢冷水泼下来，不收兵也得收兵，赶快刹车。第一把火就这样半途熄火。让中央耍了一把。

当时全临汾地区反“走后门”就数我积极，因为我刚到襄汾，屁股干净，敢反。自己思想幼稚，头脑简单，把毛主席当神，把党中央当“庙”，虔诚信仰，有令就行，有禁就止。根本不知道上边有人还会口是心非、勾心斗角、男盗女娼，干卑鄙勾当。其他县老书记们经验丰富，按兵不动，凡是上边的风刮来了，总是先观风向，看看周围动静，不轻易盲动。通过这一波折，那些老书记们给我上了深刻的一课，深深教育了我。

## 亲历批谢闹剧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中央下令停止反“走后门”几天之后，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央发表初澜批判晋剧《三上桃峰》的文章，说《三上桃峰》是为刘少奇翻案，攻击毛主席革命路线。

三月八日，江青特意穿上军装，到首都二七剧场看《三上桃峰》演出，炮轰谢振华。

三月十八日，当时中央政治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华国锋、纪登奎、李先念、陈永贵等十二人接见赴京的山西省委十二位常委，声色俱厉批判谢振华，并要追谢振华“反极左，批个性”，炮制《三上桃峰》的黑后台。谢振华顶得很硬，斩钉截铁回答追后台的人：“我没有黑后台！”陈永贵逮住了机会，大肆攻击谢振华反大寨，李先念说了些阴阳怪气、不三不四的话，听起来觉得十分低级趣味。

就在这次接见中，中央决定让陈永贵回山西主持召开省革委扩大会议，继续揭发批判谢振华的问题。

三月二十四日，我从襄汾到太原海子边大礼堂报到，参加省革委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央领导人接见山西省委常委的谈话纪要。讨论后，由谢振华检查。接着就揭发批判谢振华。在迎泽宾馆二楼会议厅，面对面与谢振华“拼刺刀”，揭发谢振华反大寨、反陈永贵、批极左、批个性，“一打三反”和落实《七二三布告》制造冤假错案……后来，揭发出谢振华在一九七一年庐山会议上，将山西省革委农业学大寨的决议，请陈伯达审阅修改一事，问题立马就升级了，说谢振华上了“陈伯达的贼船”。就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批判。陈永贵、王谦、王庭栋、阎同茂等都追问谢振华为啥要把“纪要”交给陈伯达修改，与陈伯达有什么勾结，作了什么交易，是不是上了贼船……谢振华回答，因为陈伯达当时是中央常委，是党内秀才，想让人家对“纪要”文稿出个高招，在政治上把把关，提高文件的质量。许多人追问是不是“上了贼船”，谢振华说“没有”。许多人起哄说：“上了贼船啦！”“没上！”“上了！”在会议上你来我往，吵吵闹闹，吵闹了好几天，也没有结果。

几天后，放出重磅炸弹，公布了谢振华在山西“篡党夺权的黑纲领”，也叫“黑九条”。接着，批判开始了，大会、中会、小会“上纲上线”，群起攻之，这

可是抓住了谢振华篡党夺权的“真凭实据”呀！正当反谢的人欢欣鼓舞，拍手欢庆批谢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原省群众组织红联站负责人、省革常委段立生，在开会人员驻地各处贴出了声明，说所谓的“黑九条”不是谢振华的，是段立生自己曾经写给谢振华的一封信，对山西的工作提出的建议。

段立生的声明，对陈永贵、王谦以及欲置谢振华于死地的人是当头一棒，弄出一个政治笑话，使他们非常尴尬。在人们七嘴八舌冷嘲热讽议论纷纷的情况下，陈永贵、王谦采取鸵鸟政策，不看明摆着的事实，坚持认定“黑九条”就是谢振华的篡党夺权纲领——因为谢振华看过，执意继续批判，让各大组、各地区召开中会系统揭发，深刻批判。段立生反问王谦，你看过“毛选”，难道“毛选”就成了你的吗？无言以对。谁有权，谁有理！

临汾地委书记赵雨亭在这次批谢中跳得很高，在会上声嘶力竭地斥责谢振华，在大会上多次发言给谢振华罗织罪名，扣大帽子，看那样子想一棍子把谢振华打死，又想在陈永贵面前显示他紧跟、效忠陈永贵的姿态。每次批判会前，赵雨亭总要组织几个“打手”，诸如临汾一个姓刘的女人，翼城一个姓和的男人，炮制一些“炮弹”，重点轰炸。这回要批谢的“黑纲领”，赵雨亭非常积极，亲自到各个小组发动、组织、到了我在这个组，指定我发言，我说段立生已经声明是他自己的，怎么还当成谢振华的黑纲领批？赵雨亭根本不理睬我的质疑，决意进行批判。第二天临汾地区开会批“黑纲领”，轮到我发言，我只字没提“黑纲领”，而是讲了谢振华工作中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这又与赵雨亭正面发生了冲突，他对我非常不满。文革中有人看风使舵，趁风扬土，落井下石，为了个人目的，出卖祖宗都做得出来。老实讲，我说不出昧良心的话。说违心的话，自己对自己就过不去。

这次批谢各种人粉墨登场，施展才艺充分表演，使我又真正看清了一些人的面目。他们中间有的人，在谢振华掌权时，“司令员”长、“司令员”短，什么“谢司令员谆谆教导我们”……什么甜言蜜语都能厚颜无耻说出来。赵雨亭也是对司令员赞不绝口，经常想打听谢司令员的动态，想什么办法能投其所好，能拍上马屁。谁知，政治气候一变，一个人失去了权力，那些拍马屁的人，马上面孔一变，对原来吹捧的当权者落井下石，恨不得一石头砸死，能争个“打虎英雄”当当。前几年，赵雨亭先后在北京和太原编印了两本自传，自传中说他“在批谢时弄不清谢振华的问题，一直采取消极态度”。这就有点文过饰非、不实事求是了。不过也可理解，批谢毕竟是“四人帮”发动的，江青带头炮轰的，即使赵雨亭积极批谢也是紧跟中央，无可厚非。多年的党内斗争，已形成了一种政治生态，左比右好，越左越革命，左可以升官，右常挨批斗。这当然会鼓励一些人向“左”运动。多年的党内斗争，已经形成一种党文化，老传统。在批谢中，我看见了许多的政治小丑，使我恶心，不能与他们同流合污，要保持一个“人”的尊严。

批谢会议开了五十多天，越开越没劲，越无聊，参加会议的人好吃好喝，每天无所事事，逛大街、溜公园、打扑克、闲聊，盼着会议结束，但是批判弄不下个结果，无法收场。

到了六月初，晋南开始割麦的时候，中央又叫常委赴京汇报。省里让县委书记趁会议停歇，回各县抓一下生产。我就在这时回到了襄汾。

一回到县城，就看见满街的大标语：“李辅是谢振华的黑爪牙！”“打倒李辅！”“挖出谢振华伸向襄汾的黑手！”到了招待所，郝所长惊慌失措，一改往日的热情，以无奈的样子接待我。晚上回到我的办公室兼卧室，只有办公室干事王耀堂和往日一样，陪着我。县委机关大院冷冷清清，人也稀少，能回家回村的大多已经回去了。见了熟人，也一个个变成哑巴，只敢冷眼旁观你几眼，不敢和你搭话，气氛的紧张，令人窒息。

晚上还没有吃饭，襄汾钢厂的毛集中带了五六个人，把我围在办公室，与我“拼刺刀”，追问我与谢振华的关系，提出许多莫名其妙的问题。这几个家伙都是文革期间的武斗骨干，毛集中是一个武斗头子，从农村出来参加武斗，后来被派头头张某收留，还当了襄汾钢厂的团支部书记。这些人认为时机到了，又是他们大显身手，行武立功的时候了，急急忙忙跳将出来，上场表演。他们气势汹汹，蛮不讲理，声嘶力竭地叫喊。我心里没病，光明正大，根本不怕这些小丑，义正辞严，驳斥他们的污蔑和质问。他们也不敢动手，办公室只有王耀堂来劝说他们几句，没有别人来出面保护我。单枪匹马对付这几个家伙。相持了十三个小时，围攻我一个通宵，没有任何收获，悻悻收场。

我在县里呆了两天，到农村看了看收麦的情况，收成不好，又是一个减产年。群众的情绪也不高。唉，文革的混乱状况，没有人工作，没有人关心群众生产、生活，老百姓为了自己的生存，只得勉强干活，争取收获点维持生命的口粮。农村的凋零、破败是与政治形势密切相联的。

襄汾的邪恶势力想通过围攻，把我吓倒、赶跑，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我用行动告诉他们，李辅是吓不倒赶不跑的，我还要回来担任县委书记，领导襄汾工作。襄汾这些闹事的人，把我划到谢振华线上，以为谢振华一垮，我也跟着垮台，其实他们的算盘打错了。我并不是靠人身依附和搞派性上台的，我是凭自己的能力和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受到许多领导的器重和认可的，说到这里，需要回忆一下我和王谦的关系。

文革开始，我曾组织机关干部敲锣打鼓给王谦老婆葛植青送过大字报，“摸了老虎屁股”。运动初期，王谦知道我造过他老婆的反，曾气狠狠地说：“像李辅这样的人，运动后期要开除党籍！”当插队到了阳曲后，我又和葛植青分在了一个公社，王谦也在这个公社大孟大队蹲点，大家的处境都变了，心情平和了，比较客观地观察对方，和以前的认识不一样了，态度也转变了，不仅没有敌对情绪，而且变成了可以交心的朋友。每逢我到阳曲县里开会，看望王谦，一聊就是半夜。不管是走资派、造反派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绝对、永久对立的。那时，谁都是听毛主席、党中央的，并没有私仇。一旦都面向实践、实际，矛盾和误会就会解决和消除。邓小平却不是这样，把造反派当作最可怕、最危险的敌人，担心用他的一套办法卷土重来，所以一刀切，在政治上都置于死地。

一九七三年春节从襄汾回家过年，王谦三次到我家去看我，恰巧我都不在。

本来是邻居，王谦又是老首长，我应该去拜访他，王谦却三次去看我，我老婆让我去看看王谦书记。当时我没有主动去看他，不愿让人说我攀高，“巴结领导”、“找后台”。在王谦三次看我后，我听了老婆的话，就去拜访王谦书记。王书记说：“想见你也没什么事，你去襄汾时，我正去上海开会，没有见面。我就是想和你说说我三十四年前当县委书记的经验。就是说当县委书记要学什么，抓什么？一要学会把握全局，二要学会执行政策，三要学会用人。把握好这三条，就可以当好县委书记。”他说得很中肯，是经验之谈。对我一个新上任的县委书记有很大的启示和帮助。

襄汾反对我的那些人，根本不知道我和王谦交往的情谊，以为批谢以后我会跟着倒台，判断完全错误。就在批谢最厉害的时候，我在迎泽宾馆理发室遇见了谢振华司令员，我和以前一样问候了谢司令，谢司令向我了解了襄汾的工作和刘天佑政委的情况。他说刘天佑是个大老粗，在六十九军是群工处的，文化不高，也不多动脑筋，人还是个好人。我表示了赞成。

也是这个期间，王谦把我叫到宾馆六楼和我谈话，他说经过多年的观察，年轻干部里边农民还是郭风莲，工人还是牛发和，知识分子干部中还是你，你们这几个人表现都好！

谢司令员调离山西，王谦担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以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份，省委重新任命我为省委农村政治部副主任。这一任命更说明王谦和省委对我的态度。我当官，不靠派性，不靠后台，靠的是自己的品质和能力。对领导干部，我不因其失势而落井下石，也不因为他得势而吹捧拍马。老实做人，这是我的宗旨。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开了一百二十三天结束了，创办了山西会议历史记录。最终谢振华、曹中南调离山西，王谦担任了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

## 树起四个典型

会议结束回到襄汾，我就组织人马开始全面调查襄汾的情况，树起四个典型。

赵炳、杨耀水、赵占华等人跟随我首先到了中陈大队。中陈村是汾河沿岸的一个村庄，两千多口人，五千亩地，还有三千亩河滩地，自然条件非常好。以前是个落后村。四清时，支部书记崔礼生被打成“走资派”下了台。村里选不出一个当书记的人。公社就把四清借调干部、公社团委书记席德喜派回村当了支部书记。席德喜三代贫农，寡妇养大，土改时分得地主一个门楼，修起了一间房，有了自己的家。所以对毛主席很感激，听毛主席的话，事事带头。“四清”时被借调出去当了干部，“四清”结束后当了公社团委书记。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〇年，村里偷盗成风，打架斗殴、歪风邪气甚嚣尘上，坏人猖狂，好人受气，生产落后。公社曾在中陈开过“三荒”现场会，即草荒、地荒、苗荒，是没有人干活造成的结果。

席德喜一九七一年回到村里，首先打击歪风邪气。他组织了几个哥儿弟兄们，按当时“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号召，成立了劳教队，让“地富反坏右”每天早晨清扫街道。把那些调皮捣蛋、特别是戴有“帽子”，又言行不规者，大会批、

小会斗，反正杀鸡给猴子看，把阵势压住了，歪风邪气下降了。村子南边有一条沟，沟里有一股泉水，席德喜看准了这股泉水。冬天组织全村男女老少，车推肩扛，运土筑坝，要修一个水库。经过三个冬春，终于建成可蓄一百六十万方水的一个小型水库。在修库的同时建机房、安水泵。两台水泵同时开机，用不了一周就可以把五千亩地普浇一遍，实现了水利化。粮食产量节节上升，社员分红年年增加，群众生活日益改善。

我到中陈下乡，第一天派饭，就到了德喜家。一间破房，门背后有一捆用秃了的镢头、锹把，都是三年修水库报废的。不用多说，看见这一堆用残的工具，你就知道德喜是一个实干家。

村里住着一个公社蹲点干部郑昌文，熟悉农业，很有头脑，口才也好。开始接触印象很深，随着深入调查，确认郑昌文是个人才。细一了解，昌文是电业局的工人，县里一直当干部用，“以工代干”，多少年转不了干。郑昌文戏言，他是“一盘辣椒，谁都喜欢吃，就是上不了正席”。深入了解，昌文家庭成份是富农，父亲是戴帽“反革命”——解放前曾在临汾中学当过国民党的支部书记。受这些牵连，昌文学校毕业后就回村参加劳动。在初级合作社时，宋澜识才，就带着他搞农业。文革中到电业局当了工人，实际上一直在县里工作。昌文在中陈蹲点，在种植技术方面帮助了德喜，对中陈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摸了些农业学大寨的典型，总结出“北张的方向，中陈的精神，赵康的路线，贺家墓的干劲”。

北张的支部书记党六娃自身作风过硬，抓思想工作，全村团结一致，改变了生产条件。

赵康公社自力更生，坚持打井，改变了生产条件，成为全县最富的公社。

值得称赞的是贺家墓，一看村名就明白，这里原来是一方墓地，山东来的穷人给贺家看墓，繁衍生息，到七十年代村里有了四十多户，一百多口人。这个小村，连一条通小车的路都没有。我第一次到贺家墓调查，司机李克明开车爬坡，看不见前边的路，车一歪，有两棵杨树挡住，汽车没有掉进旁边深沟。后来县林业局的干部说“林业局救了李辅一条命”，指的就是两棵杨树的功劳，这是我坐汽车第一次遇到的险情。后来贺家墓村的社员出来，帮着扶、拖、拽，才把汽车弄到安全地方。

贺家墓算得上穷山恶水，全村的地，没有多少土，薄土下面都是料姜石。他们开始学大寨时，全村出动，挖地三尺，捡去料姜石，然后用平车、箩筐收集好土，垫到挖去料姜石的地方，加厚耕作层，造出“海绵田”，就是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改天换地，夺得了丰收。

这四个典型有许多感人的故事，事迹生动，成绩突出。在一九七四年秋后召开的全县四级干部会议上，推出这四个典型，振奋了人心，全县掀起了学大寨的高潮。

## 正确处理基层问题

省委工作队分了六个组包了六个大队，汾城公社曲润海和杨貽世包了北膏腴大队，王川包了高家庄。武正国和黎秀媚包了古城公社西王大队，赵丰田、李淳包了关村大队，李果和尉茂盛包了西贾公社德西毛大队，姜斯栋包了义东毛大队。这六个大队，条件都不错，但是大队的生产和社员的生活都不好。北膏腴算是先进一点的村，支部书记王长生不参加劳动，以权谋私，社员普遍不满。关村大队集体经济倒塌得几乎一无所有。村办小学，教室窗户破了，买不起糊窗户纸，冬天教室不生火，冻得学生在太阳地上上课，老师用的粉笔也没钱买。

经过调查发现，农村经济的破败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文革的破坏，处于无政府状态；二是干部搞特权，作风不正，有的甚至贪污；三是县里强迫老百姓种高粱，老百姓不喜欢吃，也不愿下工夫，干群扭着劲，形成恶性循环。工作队听到的多是群众对干部的不满，最容易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换干部，村里能当干部的人都轮流过了，选不出称心如意的人。有的社员也不愿再换干部了，说，好不容易几年时间喂肥了，你现在再换一个空肚子，上台后“吃”得更狠！到了后期，工作队内部也往往因为要谁上台发生分歧，闹得厉害时，我就去出面调停。

（下图：1974年李辅〔前排中〕在襄汾中陈大队下乡蹲点时和大队干部及解放军总政五七干校前来参观学习的学员合影。）



基层情况不好，县里机关也一样。有权的部门的领导，凭借掌握物资和资金的分配权，吃、拿、卡、要，向生产大队伸手，群众对此恨之入骨。县革委副主任杨某，就用批化肥、水利款等手段在城郭村盖起了五间大瓦房。农机局韩某用分配拖拉机的

权力，从浪泉公社弄来了木材，从上北戍村调来工程队，不花分文，盖起五间大瓦房。类似的例子不少。听到这些我就同情社员，痛恨贪官，有时在会上揭露这些歪风邪气，因此得罪了屁股不干净的干部。农机局、水利局、打井队的几个头头臭气相投，扭和在一起与我对抗。他们又通过老乡的关系和轧钢厂、药材公司等单位的头头纠结在一起，成为襄汾县里的反对派。他们在暗地里煽风点火，散布不满。有时写匿名信告黑状，有时在大街上贴大字报，造谣中伤，煽动派性。我一身清白，不怕阴沟刮出来的邪气，大胆地与他们斗争。本来上下一致，内部团结，这些人并没什么可怕，可是社会上千丝万缕，盘根错节，上下串通，内外勾结的事常有发生，最为典型的是“小郭村事件”。

邓庄公社小郭村，文革中是闹得最凶的一个村。襄汾砖场工作的张某，是参加过淮海战役的军人，在战场上负伤，是伤残军人，后转业到地方在县办砖场工作。他支持其弟弟小顺子，在村里称王称霸，欺负百姓。比如社员上地，小顺



子有一个箱子，里边装有牌子，社员上工要疯跑到地头抢箱子的工牌，一旦没抢到工牌，你就失去了记工分的权利。社员要表示不满，就遭到拳打脚踢。村里的社员对小顺子欺负百姓，横行乡里，表示义愤，上访上告，解放军派工作队去解决问题。小顺子支使他的母亲到解放军住处在床上拉屎拉尿，硬是把支左解放军赶走。地区公安局曾二次下发逮捕证，竟然逮不住小顺子——公安局有人给通风报信。

我去襄汾后，地区公安局又第三次下发逮捕证。襄汾县公安局当时没有局长，教导员王有富给我汇报后，我不信这个邪，亲自部署，公安局终于在砖场逮住了小顺子。抓起小顺子后，他们全家出动到县委围攻我，到地委去闹事。地委决定派工作队到小郭村彻底解决问题。不久，就派出以农机局张局长为首的工作组，工作组进村后经过调查，和以前掌握的情况一样，工作组非常同情小郭村受欺压的群众，给地委汇报要求严惩小顺子。后来地委召集地县常委联席会议，赵雨亭提出要释放小顺子，我据理力争，质问地委事实有无出入，他们不作回答，就是要求放人。会议不欢而散。县公安局也只好执行上级指示把小顺子放了出来。这如同放虎归山，小顺子后来又与全家人一起来围攻我。我告诉他们，逮捕你是地区公安局批准的，工作队是地委派的，放人也是地委决定的，与县委无关。你们有啥说的，去找地委。我也采取一推六二五的做法。

事实没变，地委的态度为啥大转变？是怕了，还是派性作怪？不得而知。从这件事情看，地委领导出尔反尔，使县委处于被动，反而助长了张家的嚣张气焰。通过小顺子事件，我对地委的信任程度大减，这样的领导还靠得住吗？还敢为他们冲锋陷阵吗？他们为了保自己，或者为了私利搞政治交易，随时可以牺牲下边的同志，这种领导，靠不住，这是我通过小郭村事件得出的结论。

一些落后的老大难地方，都有一股恶势力，只要上下一致，敢抓敢管，问题并不难解决。认识不一致，问题越拖越大，解决也越来越难。

### 朝拜虎头山

一九七四年秋，地委组织大批人马到大寨参观学习，据说地委书记先派山西原反修兵团头头刘玉虎到昔阳找派友，看陈永贵是否会出来接见地委书记赵雨亭，得到明确答复后，地委组织地委常委、革委副主任，各县委书记和革委主任，地直机关各部、局书记、部部长共六七十人的队伍，分乘 30 多辆汽车，地委书记还带着夫人，浩浩荡荡向昔阳进发。

第二天一早到达大寨，正逢陈永贵接见阿尔巴尼亚的客人。送走外宾，陈永贵就接见了我们的地委书记。新华社记者董荣贵在场，卡嚓卡嚓，拍了许多陈永贵接见地委书记的照片。后来冲洗放大，书记的办公室、家里，凡是显眼的地方，都挂上了陈永贵接见书记的照片。

这真是学大寨？否。这是一次朝拜，投名状、表忠心的活动，也是一次捞取政治资本的活动。山西许多干部知道，我们地委书记于一九六七年被揪到大寨批斗时，被大寨、昔阳的造反派打折了胳膊。这刻骨的仇恨难道忘记了吗？不会，



人家宰相肚里能撑船，这是政治家的大度。

山西学大寨，许多人不是学习先进经验，而是要亮明政治态度，基本立场，站在哪一边。对大寨的态度，是划分敌我的分界线。学大寨只是挂在口头上，干什么事，都是做样子让陈永贵看，是一种表演行为。要从这一点分析，赵雨亭的表演也是一种无奈，是党内生存哲学的驱使。

临汾地区年年喊要学大寨，粮食产量超 20 亿斤，喊了三年也没达到。为什么？因为没有在全区采取真正增产的措施。仿照大寨造海绵田，修小平原，都是表明紧跟大寨陈永贵，能达到这个目的，就满足了，百姓死活根本不管。那几年，翼城、曲沃有些村用拖拉机送群众到襄汾去讨吃要饭。这就是这些地方学大寨的写照。学是假的，骗却是真的。

### 昔阳也骗人

“学大寨，赶昔阳”，要求干部都带头参加劳动。山西的报纸介绍昔阳县委领导如何参加劳动，每年坚持一百天。这些宣传，我都信以为真，拼命努力，争取做到。一年到头在县委机关呆的时间很短，往往是一开完会，马上就到蹲点大队参加劳动。夏天收麦，头顶骄阳，和社员一起收麦、打麦；春天与社员一起植树，备耕；冬天地里的活不多，就参加积肥。在南膏腴村蹲点时，天还不亮就起床，和社员一起到牛棚马圈铲粪垫土。我老老实实，以参加两个半天劳动算一天，就这样千方百计挤时间劳动，一九七五年一年才劳动了 82 天。当时苦恼得很，为啥这样一个并不难的革命化措施，自己都做不到呢？昔阳县委的干部那样忙，为啥人家能做到呢？我深刻地反省，并写了检讨，还以县委的文件通报批评自己未完成全年百天劳动的错误。

我学大寨、赶昔阳，因为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也因为大寨最初艰苦奋斗精神感动了我，是十分真诚的。文革中，陈永贵成了山西派性头头，对此，我非常不满。粉碎“四人帮”，昔阳的问题揭开以后，我才知道昔阳县委每年参加百天劳动完全是假的，根本没有做到，是欺骗宣传。不但干部参加劳动是假的，连年丰收也是假的。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七年，虚报产量就达二亿七千万斤。昔阳在陈永贵的带领下，也演了不少欺骗全国人民的丑剧。

### 让科学指导生产

一九七五年麦收后，我和县委办公室副主任赵占华骑车下乡，随机到一些大队调查，既总结增产经验，也发现存在的问题，寻找进一步增产的潜力。

通过调查发现，襄汾虽然是一个全省重点麦产区，但在小麦生产上还有不少落后的东西，如种子，还沿用单干时的老品种；播种用二腿耩、三腿耩，播种机尚未大面积普及；施肥用磷肥做底肥还很少；管理上春追、中耕、浇水仍很粗放；收割时一直到麦穗灰白，弯了头，才开始，没有抓住腊黄期，小麦丢失严重。通过调查了解，抓小麦增产的措施已成竹在胸。八月份在全县小麦生产会议上，我代表县委的报告中提出襄汾县小麦生产的“五大革命”，一是种子革命，推广北京十号等优良品种；二是播种革命，淘汰木耩，普遍采用播种机；三是肥料革命，

大力推广磷肥和碳氨作底肥；四是生产条件的革命，发展水地；五是管理革命，实施科学管理，从种到收应如何做，才算科学，作了明确的阐述，并进行了播种的示范。在召开小麦会议以前，农业局就预先搞了各种对比示范田，如用播种机播种的和用老式耩播种的对比，施用磷肥和不用磷肥的对比等，把生产队的干部请到现场，一看示范田，农民“眼见为实”，再不用说什么，他们就心服口服了，一九七五年秋季播种小麦有了明显的改观。一九七六年夏收，全县小麦大丰收，总产 27881 万斤，创造了历史记录。

从抓小麦生产，我自己体会到，在山西农学院学习的农业知识，发生了作用，用到生产实践中去了。同时，体会到科学知识和领导权结合就会产生巨大的效益。一个好的领导干部一定要懂科学，用科学指导工作。掌握科学知识的人，如果要让科学指导实践，最好掌握一定的权力。

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大丰收后，首先满足广大农民的需要，口粮标准规定每人 400 斤。对国家的贡献大幅提高，由过去的三千万斤左右，提高到六千万斤，位居全省第二。除此之外，对城市职工干部每人增供 60 斤小麦，改善生活，实际上等于给职工增加了两个月的口粮。

惠民政策的实施，为国家多作贡献的实绩，上上下下皆大欢喜。为老百姓办了实事、好事，领导自然就有了威信和号召力了。

### 参加第一次全国学大寨会议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中央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分两个阶段，首先在昔阳县召开，全国二千一百多个县的县委书记参加，省、地委书记全部参加会议。

头一天大会，在昔阳县拖拉机厂未完工的大车间举行，每人发一个马扎，大家都坐在马扎上听报告。会议很隆重，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亲自到会并作主旨讲话。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有江青、华国锋、纪登奎、吴桂贤等许多人。小平同志在讲话中，首先讲形势，说形势大好，形势喜人。说建国 25 年的努力，工业、农业、科学方面都打下了基础。农业解决了八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了不起。接着讲我们农村落后，人均产值才一百多元，贵州省只有 70 元，农村还很穷。全国二千二百个县，有三百个学大寨学得好，如果有三分之一学好大寨，粮食就放不下了。小平强调这次会议仅次于七千人大会，意义可能超过七千人大会。他还强调，学大寨要真学，不要假学，半真半假学。学大寨，县委这一级很关键，相当于军队的团一级，既是执行者，又是决策者，要抓好县委班子的建设，选好掌权。他讲，毛主席说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科学需要整顿，重申了他重新执政后抓的主要工作。小平同志讲话过程中，江青不时插话，小平有时不理睬，有时顶了回去。说到全国有些地方现在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以前，江青插话，是个别地方。邓小平说，个别地方也是不得了的事情，就是个别地方也是值得注意的事！

当时，我十分崇敬和崇拜毛主席，把江青和毛主席是放在一起对待的。看到、

听到邓小平一直顶江青，心里接受不了，产生了不满情绪。甚至在一九七六年还把这件事作为批判邓小平反对毛主席的一个证据。总之，这次会议暴露了中央内部并不一致。

会议在昔阳参观了三天，后来中央派专列把参会人员接到北京。我们山西和四川代表团住在北京市委党校大楼。到了北京继续开会，华国锋代表党中央部署在全国开展基本路线教育，要批资本主义，整顿领导班子，解决“五种人”掌权的问题。五种人指走资派，民主革命派，老好人，钻进班子里的坏人和阶级异己分子。大寨、华西、安乡等地介绍了学大寨的先进经验。会议开得很好，大家的劲头鼓舞起来了，决心回去大干一场。

会议结束前，中央宣布决定调赵紫阳到四川工作，任省委第一书记。在北京市委党校，赵紫阳接见了四川全体参会人员，讲了话。会后，四川的干部个个喜笑颜开，异常兴奋，都认为赵紫阳到了四川，四川就有了翻身的希望。我们也被四川干部所感染，为他们而高兴，庆幸他们迎来了一个好省委书记。

参加农业学大寨会议有一个特别场面，值得记述，就是到王府井商店购物。那时，商品奇缺，只有北京供应较好，有一些外边买不到的紧缺物资。王府井专门为会议人员安排了一次购物，是我们享受的特权。

那天晚上八点以后，王府井商店对外业务下班，专门等待参加会议的人员购物。到了九点，王府井大街开来几十辆大型客车，参会人员下车后蜂拥进入王府井商店。购买力强的是老干部，像我们临汾地区革委主任身带500元（当年算是巨款），专门要在北京采购。像我这样的“官”，咬紧牙关只带了五十元钱。到了王府井商店，老干部给老伴、儿女、孙子买吃的、穿的、用的，大包小包带了很多。当时物价便宜，500元钱可以买许多东西。我带的这50元，只能说为自己买件“的卡”中山装，然后给孩子买点北京特产，所谓的八大件，再给同事买点在襄汾见不到的雪茄烟，作为礼品，回到县上给吸烟的同志送上一支。当时社会物资奇缺，像“的卡”、毛线、毛料等物品，外地商店很难买到，会议组织者也是为了照顾基层工作同志的需要，给开了个大后门。

说实话，当时大家的生活都比较清贫，就是工资较高的老干部与我们的差距也不像现在贫富差距这样悬殊。那时，领导干部的日用品还都自己买。现在民间流传的“工资基本不动，食用基本靠送”的所谓领导干部的“基本路线”，可以折射出党的腐败的演变过程。

### 我们怎样搞“基本路线教育”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以后，省委大抓农村基本路线教育，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重点解决基层班子“五种人”掌权的问题。省委派了大批工作队下乡，省委办公厅还是负责襄汾县，继续包点。十一月份吴象（省委调研室主任）、阎平（省外办主任）、曹有成（省政府副秘书长）、常玉堂（机关事务管理局长）等带了一百多人进驻襄汾六个公社，二十多个大队。这一百多人中，年轻人多，没在农村工作过的多，宾馆、招待所

服务人员多，有干劲，有朝气，缺乏经验和办法。进入农村后，经过调查，听了群众的反应，看基层问题多了，看干部黑暗面多了，头脑发热，运动中搞逼供信，很快在西贾席村、赵曲、贾庄，逼死了几个村干部。老吴象和我都急了，赶快开会“泼冷水”“降温”，严格政策和纪律。现在重新反思，当时，我们哪里有“人权”的概念，哪里有“法治”的概念，哪里有“问责”的概念？一搞运动就是“七斗八斗”，就是“逼供信”，人整人，习以为常，而且整人的人，从来不承担后果。这是共产党多年来搞运动形成的一大弊端。

学大寨赶昔阳，要批资本主义，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不懂，上边也没有明确的概念。过去整社员，自留地、自留羊，甚至多喂几只鸡，都是资本主义。老百姓曾经不满地说：“一铺一盖，一碗一筷，除此以外，全是祸害。”学大寨运动中，对重副轻农，弃农经商，都作为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反正只要跟领导的要求和主观意志不一致，都要给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我当时从理论到实践也弄不清什么是资本主义，有一个老主意，认为干部损公肥私、侵吞集体财产，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就是资本主义。所以我批资本主义，不管是机关干部或是基层干部，只批贪污盗窃的违法和犯罪行为。

一九七〇年代，党内腐败比起现在要少要轻，但也日益严重，引起群众的不满。襄汾县药材公司经理、党支部书记谢必泰，请求上级主管部门拨款五十多万元修建药材库，在城南购了12亩土地，谢利用修药材库的机会，占用公司已购土地，使用公司购买的材料，先为自己和另一主管建设的领导，盖起了二处崭新的院落。由于他们的侵占，资金短缺，公司的仓库只建起了四堵墙，停工放在那里，还得花钱雇人看管，给国家造成了严重损失。一些掌管物资和投资款的负责人，逼迫农村干部送礼、行贿，借权发财。有的生产大队干部凭借权力，欺压百姓，鱼肉人民，成了恶霸。

最典型的是古城公社上北戌大队支部书记卢小锁，私设公堂，常把戴“帽子”的家属、女儿扣押到大队，然后敲诈。全村人都知道卢小锁爱吃公鸡肉，每当卢小锁借故欺负社员时，社员就赶快送上两只公鸡给卢小锁。因此，上北戌全村公鸡让卢小锁吃光，孵小鸡还得到外村换蛋。卢小锁的劣迹不能细述，但从吃光全村公鸡一事，即可看到其“座山雕”似的面目。襄陵镇红卫公社有一个民办教师，强奸了二十多个女生，一个十四岁女生怀孕才暴露其罪行。但因其叔叔是大队副书记，受到包庇。后被发现，查办下来，把那个不如禽兽的教师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当时有人说情，有人说判得太重。我反问：要是你的孩子被糟蹋，你是什么态度？他们都不再说话了。

“要说公道，打个颠倒”。我们应当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处理问题。像这类引起民愤的干部，不批，不处理，任其胡作非为，显然有失民心。俗话说：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我就是本着这样的理念，一直毫不手软地打击党内的腐败行为和歪风邪气。这样，襄汾干部的风气越来越好，社会风气也向好的方向发展，但这样做也为自己的政治前途埋下了定时炸弹。

### 在南膏腴村蹲点

一九七五年冬季基本路线教育，我和常委、革委副主任史崇实，在南膏腴大队蹲点，南膏腴是一个大村大队，全村四千多口人，与北膏腴村只一路之隔。南膏腴自然条件很好。党支部书记赵随流，是个“懒”人，工作懒，劳动更懒。遇事不讲原则，送人情，助邪风，当时认为其“阶级立场有问题”。主任董英基是不管事、不得罪人的老好人，还有一个副书记臧森木，与成份不好的李国栋关系密切——当时就是以阶级观点分析人和事，看你政治立场，要看和地富反坏存在的关系。李国栋“成份高”（即成份不好），有文化、会中医，村里有威望，人缘也好。村干部和他的关系也好，这就成了问题，当然属于批判的对象。要说干部的责任，生产没有搞好，当然是错误路线造成的。工作队大会批、小会批，赵随流已经有了对付运动的经验，不吭声，也不检讨。

搞了几个月也没弄出什么大问题，总不能让“懒人”继续干了，最后换班子。赵海仙，年轻泼辣、敢干、选拔为支部书记。尉中胜一直抓打井，发展水利有功，被选为革委主任。群众在运动中出出气，也有了心情舒畅的感觉。新上任的干部，“新官上任三把火”，有点积极性，总想干点事情。一九七六年春，全村搞了方田林网，又在西部缺水的地方打了两口机井，增加了水地面积，算作“抓革命，促生产”的成绩。

在南膏腴蹲点，有两件事对全县影响巨大。

一个就是植树，史崇实亲自抓规划，亲自抓实施，工作队员全部上阵，一棵一棵地瞄位、对线，一排树一条线，横竖成行，整个林、路、渠、田配套，特别漂亮，全县许多大队参观，为此叫好，推动了全县方田林网的建设。

另一件事是南膏腴的文艺宣传队，有一批少年天才演员，音乐、舞美、编导都很有才华。到县里、地区演出，人人叫好，成了襄汾轰动全县的一支文艺队伍。后来一直演到省城。南膏腴村学校为啥会出现这样一批人才，有这样一个优秀的宣传队呢？因为幕后有一个出众人才臧大海。大海很有才华，因为娶了李国栋的姑娘，背上了包袱，埋没在农村。也因为他的学识和聪明，当了代课教师。正是大海的努力，培养了许多极富表演才能的学生。而且大海可以编写剧本，能及时把村里、社会的新人新事搬上舞台。所以从思想内容方面也很吸引观众。

改革开放以后，不搞阶级斗争了，大海也解放了，史崇实当了襄汾县委书记后，把大海调到县委，提拔为办公室副主任，后来被选为副县长。

一句老话：以阶级斗争的观点看人，尽敌人；以发展经济的观点看人，尽是能人。

从大海坎坷的一生，也能折射出极左路线对人才的扼制和摧残！

一九七六年南膏腴和全县一样，小麦获得大丰收，社员的口粮增加了，对国家的贡献也增多了。当时总结，当然要归功于进行基本路线教育，归功于工作队的工作，归功于新班子领导正确，到底如何？其实老天爷帮忙是最重要的。

在南膏腴蹲点和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结交了一批朋友。尉中胜、杨天明、赵宁生、赵海仙等，以后几十年一直来往密切，相互帮助。特别是有一个平民卫水泉老人，我在襄汾住时，常到我家作客。我离开襄汾后，又不断给我写信。我

在尉村办铁厂时，又常去铁厂看我。一九九三年春节过后，非要请我到他家吃饭。老人晚年过得很辛苦，虽有儿子，但他独自一人生活，凭捡破烂度日。生活虽苦，但关心国家大事的热情不减，对歪风邪气、坏人坏事嫉恶如仇的义愤也不减，是一个非常正直、有骨气的老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此生难忘。

### 不管上级禁令坚持悼念周总理

一九七五年在北京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住在北京市委党校，在公共浴室洗澡后，身上起了癣，痒得浑身难受，吃灰黄霉素治疗，也未见作用，影响了食欲，影响了睡眠，就在烦躁的情绪中迎来了一九七六年。

年初住在南膏腴，一月八日晨，收听中央台新闻联播时，听到敬爱的周总理逝世。虽然早就知道总理患不治之症，但突然离世，从感情上还是难以接受。在北京参加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时，我直接听过总理的讲话，总理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谦虚谨慎，对人平等尊重，对晚辈青年循循善诱，以理服人，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特别是在文革的全国大乱中，周总理日以继夜，日理万机，千方百计保护老干部，千方百计稳定全国形势，真是耗尽心血，做到了鞠躬尽瘁。

突然失去了总理，就像天塌了一样。谁都知道，文革十年，是总理苦苦支撑着这个灾难的国家。为表达对总理的痛悼之情，我急忙回机关，部署悼念总理的事宜，决定在县大礼堂设灵堂，全县人民悼念三天。

全县机关干部正在忙着上山折柏枝，做花圈，写挽联，筹备悼念活动之际，以中央的名义下发了禁令，不让基层百姓进行追悼活动，不准设灵堂，不准组织群众追悼……禁令是发了一次，再来一次，连发了三次。

当时，我这个县委书记不知内情，不理解中央的通知，也不听中央的禁令，按照人民的意愿照常追悼总理。我们县委常委轮流在灵堂守候，和广大群众共同怀念总理的丰功伟绩，共同表达悲痛敬仰之情。当一月十五日，我们看到北京十里长街百万民众自发挥泪送别周总理的悲壮场面时，更激起我对总理的热爱和尊敬的深厚感情。党中央下禁令阻止全国人民自觉自发悼念周总理，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认为有问题，想不通，疑虑重重。不过也只是觉得中央有些人对总理没感情。

### 消极应付“追反追谣”

一九七六年初，我老婆决定离开太原，调到襄汾工作。三月份办理调动手续后，月末，领我岳母并带上我三岁的儿子到北京去探亲旅游。四月四日晚，他们正在天安门广场，目睹了群众悼念周总理的宏大场面，也听到了吴德劝说群众离开天安门广场的严厉的讲话。人们的气愤和不满已经沸腾，政府已经忍无可忍并准备行凶。终于在当天晚上发生了流血事件。当局动用了数万棒棒队，驱散了广场上悼念总理的群众，广场上留下了人民的鲜血。第二天，我老婆再去天安门广场，看到许多人用高压水龙头冲洗天安门广场的血迹，企图洗刷镇压人民的罪行。

党中央发布了由毛主席批准的决定，指责邓小平是事件的总后台，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在此之前，事实上早就开始批判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

命”，邓已经不再主持国务院工作了。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没有人相信，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对悼念周总理的活动的镇压，充分说明了中央有人反对周总理。他们不得人心，与全国广大人民站到了对立面。

我老婆看到天安门广场的血腥镇压，赶快离开北京，绕道大同，回了应县，又看望了我的母亲（我父亲已去世了）。当老婆到了襄汾，介绍了她目睹天安门广场镇压的实况，我更加明白了，原来中央宣传的全是欺骗人民的舆论。

紧接着中央部署“追反追谣”运动，把参与四五运动的人，作为反革命要进行追查。把悼念周总理时写的诗歌，反对镇压四五运动发表的言论，都作为反革命谣言进行追查。临汾地委的头头很积极，很卖劲，还创造了许多方法，比如一查到底，直到追查到最初制造谣言的人。说不出传谣的人，就要自己负责。地区还逮捕了几个“反革命”。我对地委的这些作法不满，并进行抵制。告诉追反追谣办公室的同志，不要轻易汇报什么谣言。比如有一个大队在打麦场小房的墙上写了一首怀念周总理、反对镇压四五运动的诗，一看就知道是传抄的，我告诉赵占华不要汇报。襄汾“追反追谣”没有搞过一个人，就是把人所周知的社会上一般传说的东西汇报给上级，走了走过场。

邓小平被重新打倒以后，中央部署“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作为一个县委书记，处于十分矛盾和尴尬的地位。说邓小平是制造四五反革命事件的总后台，明知不是事实。批判邓小平在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提出的“以毛主席三项指示为纲”，胡耀邦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要作为邓小平的黑纲领进行批判，觉得牵强附会。邓小平主持下整顿工作的全面展开，以整党为核心的九个方面整顿任务的正式提出，特别是邓小平提出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贯彻毛泽东思想，说得有道理，无法批判。

可是，作为拥护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对于邓小平把一切动乱的原因都归罪到造反派，对造反派不分有罪无罪，是否干过坏事，而一概指责和打击的做法，我又极为不满，思想上确实认为邓小平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

为保持襄汾形势能够正常发展，我要紧跟中央，利用一切政治口号消除不安定因素，维护稳定。为了贯彻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解决“五种人”掌权问题，我用“继续革命理论”阐述“五种人”掌权，狠批“走资派”，而且把“民主革命派”“老好人”也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来进行批判。采用的是非此即彼，非对即错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期间，确实说过错话，做过错事。当时，我没有怀疑过毛主席，没有怀疑过党中央，虽对中央的一些作法不满，根本不知道也不会想到有个“四人帮”要篡党夺权，埋头工作，盲人骑瞎马，犯错误是肯定的，不犯错误才是不正常的了。

### 干群一心完成三大工程

一九七六年，襄汾小麦生产大丰收，亩产达到352斤，总产量2.78亿斤，棉花也是一片丰收景象，群众不管你上边谁斗谁，谁掌权，只要他们得到经济实惠，能解决温饱，就心满意足了。县委在二年来的生产实践中，为老百姓谋了利

益，群众十分支持县委的工作。

一九七六年干了三件大事。

一是全县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打通了赵康通往永固，南贾通往永固，贾罕通往湖里几条公路干线。土地平整，改造低产田，动工面积大，要求标准高，很有声势。地区认为干得好，专门在襄汾召开现场会。棉花生产，全省组织人马来襄汾参观，吴吉昌劳模也赞不绝口，夸奖襄汾棉花生产搞得好。

二是麦收后，全县动员二万人，开挖七一渠延线工程，全长 16.4 公里，这是一项富民工程，把七一渠的水直送到七一水库，可扩大十多万亩水地。七一渠受益区全部在河西的社队，但是这项工程动员了全县所有 21 个公社的劳力。河东的九个公社，不讲条件，自带粮食，自带工具，不计报酬，投入挖渠工程（实际是犯了平调的错误）。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完成了襄汾县有史以来动员人数最多、开挖土方最多的富民工程。这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如今，不仅灌溉着几十万亩粮田，而且为侯马市提供工业用水和饮用水。

三是化肥厂的改、扩建工程。米庆录到县化肥厂工作后，发现影响化肥厂增产的卡脖子项目是造气不足，需要增加一个气柜，投资七八万元。县财政没有资金，县委决定发动全县干部拿出一个月的工资支援化肥厂。我和老婆要拿出九十元，这要影响我家庭的正常生活，怎么办呢？我决定戒烟，戒烟后一年可节省下八十多元，这样就可以度过家庭困难。集资了五万多元购置和加工设备，其余土方工程，机关干部义务劳动，举全县之力，顺利完成了工程，使化肥产量猛增。干部带头是完成任务，战胜困难的关键。

俗话说，三人一心，黄土变金。襄汾的实践充分证明了干群一心的力量。

### 批邓会上给地委提意见埋下祸根

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地委又召开了第七次“批邓”动员大会。在此之前的八月八日，地委还召开庆祝文化大革命胜利十周年会议。赵雨亭书记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述了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英明正确，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对中国革命指导的长远历史意义。赵书记讲话后，洪洞、侯马、安泽几个书记都高调唱赞歌，什么“及时雨”，“很解渴”，高屋建瓴、拨云见日等，我听了十分肉麻。对于临汾地委的这种风气也十分反感。九月八日开完批邓动员大会后，又召开县委书记会议，讨论如何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如何学大寨全区达“纲要”（亩产粮食四百斤）。在会上我给地委提意见，并把自己摆进去，说：“我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检讨，县委在领导农业学大寨上，没有做县委应该做的工作，还是催种催收，是县委书记的身份，生产队长的水平。”我说地委提出全区粮食产量达纲要，总产超过 20 亿斤，喊了三年啦，没有达到，照这样下去，明年照样达不到。人家河北赵县达“纲要”（亩产粮食 400 斤），过黄河（亩产粮食 500 斤），有全区性的措施。我说地委在领导农业学大寨，没拿出全区的措施，也是催种催收，是否也有点地委书记的身份，生产队长的水平？

问题提得尖锐，赵雨亭听不进去，不理解意见的本意。在后来把我打成“四



人帮”在襄汾的代理人以后，说我攻击“地委书记不如一个生产队长”，列为我篡党夺权的一大罪状。赵雨亭在写他个人回忆录《我选择的道路》一书中，又写上我攻击他“不如一个生产队长”，真是念念不忘，耿耿于怀。

九月九日上午研究“批邓”，临散会时，布置下午有专人辅导批判邓小平的三个黑纲领。本来所谓的黑纲领不好批判，硬是要“歪批三国”，我心里有抵触情绪。会上我说：赵书记，大批判还要辅导？天这么早，小麦种不下去，心急如焚，可不可以请假回去抓抗旱种麦？赵书记说，谁不愿意参加可以不参加。我说：“好的，下午我就回县里了！”

这又形成对赵书记的不恭。后来，翼城县委书记王兴亚告诉我，赵雨亭是老虎屁股谁敢摸？以前有三个县委书记给他提过意见，都被他打成反党集团，有的被整得家破人亡。你还算幸运！细想也真是后怕，那时，年青气盛，初生牛犊，心里不满，有话必说，不吐不快，硬把自己列到赵雨亭的“政治死敌”上去了。

文革期间一心想在县里干点实事，当县委书记，真难！“七品芝麻官”面对的是几十万百姓，要管他们的吃穿，不能光说不干。那时，中央管事的常变，政出多门，朝令夕改，批这批那，没完没了，弄不清真意，不知对错，无所适从。小道来的不能听，大道来的常不对。拿定主意给老百姓办实事，谋实惠，又指责你“不紧跟”，得罪了顶头上司。反对你的人还想抓你的把柄。左右为难，磕磕绊绊。“秋后算账”时，用的是“显微镜”、“放大镜”，“磨道里寻驴蹄印”，最终也难逃被整、被斗的厄运！

欣慰的是群众一辈子都记着你为他们做的好事！

---

## 【编读往来】

### 阎长贵对 20、21 期的感想和意见

两期有些文章看了一遍，特别是清华大学孙怒涛的文章。清华大学确实人才济济，虽治工科，文才很强，在回忆文革、追寻历史真相方面，起了带头和示范作用。相比之下，北大这个文科名校反倒有些逊色，但潜力很大，看到北大老五届回忆录的书讯令人振奋。两校文革都是毛泽东直接指导的，很希望两校文革经历者都行动起来，承担起“我们这一代人的最后责任”（清华陆小宝语）。

读何蜀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歌曲》一文，想到文革需要研究的问题和方面太多了，还有不少新领域需要开拓、扩展和深入，说明文革研究是一个集体——大集体的事业。

《“解放日报事件”辨》中说，《历史决议》指出：文革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一场内乱。领导者是谁？显然无误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并说，应该清算以毛泽东为首的八届中央委员错误发动文革的过失。

这样解释“领导者”，我觉得当斟酌。在文革中，毛主席和党中央（或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不是一个概念。毛泽东凌驾党中央之上，他是背着党中

央发动文革的。他自己不止一次地说：“文革这把火是我放起来的”。尽管《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都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作出的，但那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按照毛泽东的意志作出的。《历史决议》在文革定义中所指的“领导者错误发动”，从前后文看也是指毛泽东，而不是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没点出毛的名，那是为毛开脱。《五一六通知》已肯定：“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一场文化大革命”。不论从事实，还是从文件看，似都不宜说文革“发动者”是中共中央（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